

第五章 护国战争中与仁人志士共赴国难，争回国人人格

逆贼袁世凯违约法，反民意，弃誓言，瞰帝位；种种罪恶，闻者发指。滇黔首义，会师北伐，直曲既分，强弱立判。旬月之间，蜀湘震慑，遐迩响应。该逆不知自返，犹复包藏祸心。一面取消帝制，诡言调停；一面大攫金钱，阴骗士卒，拼掷孤注，取快私图，此而不杀庸有宁宇。桂粤以唇齿之形，结腹心之谊，独立义旗，后先颺举。今者，内顾无忧，齐力弥壮，克日出发，直抵燕京，除彼奸凶，光复民国。开文现奉龙都督委任为广东护国军第四军总司令，折冲自效，磨砺以须。公等均属神明之胄，谅以袍泽为怀，伟略阔筹随时见赐，无任欢迎。

——转引自郑开文撰《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

（1916年4月24日《民国日报》登载）

伟大的护国战争是云南首先发动的，孙中山先生当时评论认为：“詎料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轻，充分表露了中华民族之正魂。”每每回顾这段民国历史，身为云南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但是，作为辛亥革命元勋和滇军名将郑开文却在护国战争中籍籍无闻、名不见经传，是什么缘故？笔者在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档案馆探寻数年无果后，将目光移向他处，终于得到意外的惊喜。

广州市国立档案馆档案记载：1914年5月8日，郑开文代理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广东省国立中山图书馆编辑出版《广东民国大事记》记载：

（1916年）4月7日，广东独立后，龙济光自称广东都督，改组了他的班底：军政厅厅长郑开文，财政厅厅长汪度，民政厅厅长郑巢，司法厅厅长（检查、审判两厅合并）叶镜湜，秘书处处长唐祖澍，全省盐政处处长褚光宗，都督府交涉局局长（北京直辖外交特派员改组）陶邵彬。另成立广东北伐护国军总部，下设5个军，由段尔源、李鸿祥、马存发、郑开文、李文运分任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广东舰队司令为蔡春华。龙随又与滇、黔、桂三督联名劝袁世凯退位。

4月24日，郑开文通电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北伐。

5月8日，滇、黔、桂、粤4省护国军在肇庆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该院奉黎元洪为大总统，代行国务院职权，并将于合法国务院成立时撤销。该院采合议制，以独立各省之军政首长任抚军。抚军长唐继尧，副抚军长岑春煊代行抚军长职权。抚军有梁启超、刘显世（贵州）、陆荣廷、陈炯明、蔡锷、李烈钧、龙济光，戴戡、罗佩金（戴、罗6月3日参加）、吕公望（浙江）、刘存厚（四川）、李鼎新（6月3日参加，代表海军）。一说抚军尚有汤乡铭、任可澄。政务委员长梁启超；秘书长章士钊；外交专使唐绍仪，副专使王宠惠、温宗尧；驻沪委员范源濂、谷钟秀；驻沪军事代表钮永建。军务院所属军队建制如下（一说为9个军，留守昆明尚有唐继尧军）：

第一军 军长蔡锷，北伐入川。

第二军 军长李烈钧，三师张开儒，四师方声涛。

第三军 军长莫荣新，五旅邓文辉，六旅申葆蕃。

第四军 军长李耀汉，三旅李华秋，四旅翟汪。

第五军 军长谭浩明、副军长韦荣昌。

第六军 军长林虎，七旅李思广，八旅陈自先，混成旅黄明堂。

第七军 军长郑开文（济军）。

新一师 师长莫擎宇，一旅陈德春，二旅蓝揆芳。

五师 师长张习。

六师 师长车驾龙。

混成旅 旅长程子楷、魏邦平、唐绍慧。

3个司令 蒙仁潜、农有兴、陆长胜。

.....

云南通海人士郑开文，护国战争期间出现在广东，并有如此的建树，其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曲折离奇的故事？

第一节 护国运动与护国战争的区别与联系

为了叙述护国战争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脉络，有必要对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的区别与联系的问题，作一个梳理。从历史事件的断代（分期）角度来解读，护国运动应该以1913年3月，同盟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为起点，以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为结束标记，历时12年。期间，历经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等阶段，都是以武装斗争为特征的、激烈的政治改革，目的是维护孙中山创建的民主共和国家体制在中国得以继续实行。护国运动的实践表明，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思想理论缔造者、精神领袖，是护国运动各个战役的发动者、策略制定者和实际参与者。

护国战争的导火索是袁世凯妄图改变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国体为封建立宪制国体的大中华帝国、改民选总统为世袭皇帝等一系列复辟活动，导致革命党人开展以武力征战为手段，以“恢复国会，履行《临时约法》”为目的的护国战争，并以云南军民为主要力量首先发动，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为护国战争的主要领导者。护国战争的主要阶段以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义开始，至1916年7月13日护国军军务院宣布撤销及中华革命党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为结束标志。但是，护国战争的胜利也只能说取得了阶段性、局部的成果，其民国政府依然为黎元洪、段祺瑞等军阀把持，中国政局仍然陷入假民主真独裁、假共和真割据的军阀混战时代，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颁布、施行的《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的两个主要目标仍然无法实现。随后，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先生又发动了一系列政治、军事重大行动，如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其目的都在于履行《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体的基础，因而都可以归纳为护国运动。

孙先生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实乃是这一过程的定论。后孙中山时代，虽然国民党、蒋介石军事集团以武力统一了中国。但就本质上说，并没有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背弃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共、清共的政变，形成蒋介石军事集团的独裁统治。致使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严重倒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状依然没有改变，孙中山先生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尝试建立西方

式民主共和政权的努力全盘被毁。

护国战争 30 年后、蒋介石取得政权 20 年后，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濒临崩溃之际，祭起“召开国会”幌子，才勉强回到 1915 年底西南发动护国战争的诉求：履行《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此举实质表明：在漫长的 34 年岁月里，辛亥革命肇立的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仅成为蒋介石军事集团实行独裁统治的口头禅、挡箭牌而已。只有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想理论体系，继承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共和的旗帜，通过 28 年的卓绝领导和艰苦奋斗，摆脱了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厄运，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走在建设国强民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康庄大道上，去实现世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因此，若以“1915 年 12 月 25 日云南宣布起义开始，至 1916 年 7 月 13 日护国军军务院宣布撤销及中华革命党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为结束标志的护国战争”定义为护国运动，则“护国运动”名词的定义不能正确界定或不能包含历次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诉求，便不能正确解读孙中山乃中华民国缔造者、民主共和思想理论缔造者的重要地位作用。也不能正确认识孙中山先生是护国运动各个战役的发动者、策略制定者和实际参与者的地位、作用和贡献。反而会陷入立宪派梁启超的“讨袁护国是他与蔡锷在天津策划发起的，与云南何涉”；蔡锷的“滇始兴师致讨，是曰护国军。锷实董率之”；政学会领袖岑春煊的“军务院是他领导的”的纠缠和争论。推而延之，其结论还容易滑入蒋介石的“正统”“承继人”的泥坑中。

笔者窃以为，正确理解“护国战争”的内涵，可以准确解读护国战争时期各政党、事件主要人物的作用和贡献，也是准确解读郑开文在护国战争各个阶段的坎坷经历和历史贡献的一把钥匙，因而不揣浅陋而妄议之。见笑，见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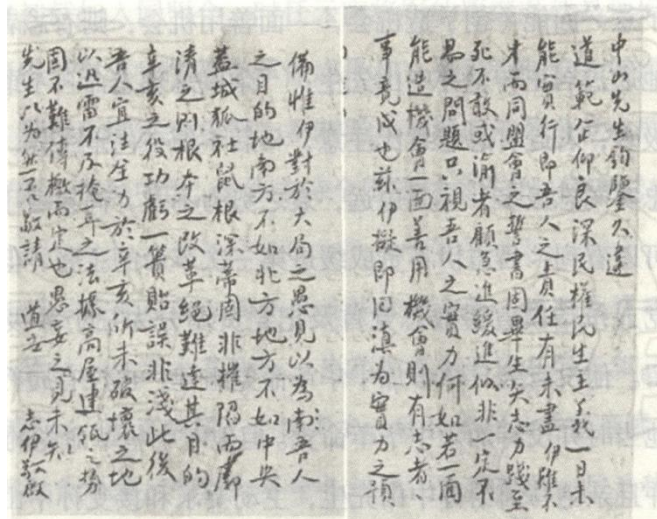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中国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在护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1912 年 4 月，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以后，并未放弃他的理想——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尽管他最初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清晰，但随着袁世凯独裁卖国的面目日益暴露，他逐渐认识到：“袁世凯的独裁较之清王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明确指出：“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一人之身”。随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就是要继续“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逐渐败露，孙中山即指出“第三次革命为不可少之举。今日救国，只有打倒袁世凯”，“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并积极筹划、组织中华革命党军事力量武力讨袁。在护国战争爆发前后，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推翻袁世凯。同时，孙中山派遣原同盟会高层领导成员、骨干吕志伊、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但懋辛等人到云南，策划云南起义反袁。因此，客观地说，护国战争的发动与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和活动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后，云南军政各界有许多中高级将领是中国同盟会的骨干会员，正如参加辛亥年间云南“重九起义”，他们始终把孙中山、黄兴奉为领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除专制，还我民权”的理想和实践，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家而浴血奋斗。分析云南革命党人吕志伊在护国战争前后的活动，颇有典型意义。新近发现的《吕志伊呈孙中山先生信》手札，是吕志伊先生 1915 年 2 月 5 日，

在赴云南策动反袁起义前夕，托革命党同志面交孙中山先生的一封亲笔信。此手札原件现保存于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在两岸编辑出版的各种有关历史资料中从未收录、披露。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充分证明孙中山先生及其为首的革命党人是护国战争最直接发动者的重要史料和珍贵文献，在两岸历史研究机构和辛亥、护国先贤后裔的合作、努力下，终于拭去尘埃，得到发掘并公之于世。

云南护国起义前夕，吕志伊致孙中山的亲笔信函。（吕志伊外孙叶祖荫提供）



云南护国起义前夕，吕志伊致孙中山的亲笔信函（吕志伊外孙叶祖荫提供）

从这一手札的信封落款上，其写作时间是1915年的2月5日。正是吕志伊回忆资料中所说的“乙卯之春……予决计回滇，企图进行”的前夕。其写作地点是吕志伊担任《民国新闻》总编辑时的工作和居住地上海。这一重要史实，成为了研究孙中山先生及其为首的革命党人策划、发动护国起义的直接历史证据之一。在信函中，吕志伊针对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关于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卖国复辟，妄图帝制自为阴谋的一些不同意见，如“急进”“缓进”以及“南方不如北方，地方不如中央”等等，向孙中山先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顾急进、缓进，似非一定不易之问题，只视吾人之实力何如？若一面能造机会，一面善用机会，则有志者事竟成也。”并请示孙中山先生：“兹伊拟即回滇，为实力之预备。”请求孙中山先生支持自己的主张，将云南作为发动反袁起义的革命策源地，发动护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据高屋建瓴之势，固不难传檄而定。”据吕志伊事后回忆，当时在日本东京担任中华革命党要职的居正先生接到吕志伊托专人带来的这封信后，“觉生（居正字）即据情转呈，总理深为嘉许，即派余赴云南工作”。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收到吕志伊的这封信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委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回到云南策动反袁起义。吕志伊作为中国同盟会核心成员，请命中山，冒死赴滇，运动滇军，促唐反袁，其态度是求同存异，重在反袁的实际行动。他认为：“略言缓进。急进均不成问题，惟视吾人之实力如何耳。予意一面能（创）造机会，一面善用机会，则有志者事竟成也。”同时，他通过居正转呈孙中山先生：“余以总理之命自不敢辞。惟日本袁派侦探极多，若赴日恐惹袁氏注意，日后不便在内地工作。滇、川、黔三省本党忠实同志极多，且属边远，袁之势力不及，尚易着手”。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到：吕志伊不赞成缓进第三次革命的主张，但对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人按指模宣誓效忠党首及把党员划分为三个等级等等的做法也有所保留。他没有到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建，也

没有履行加入手续。严格讲，他当时并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宗旨、任务完全赞同，并且亲笔写信给孙中山先生，主动要求和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和委派，以孙中山全权代表的身份赴云南开展策动反袁起义活动。吕志伊先生作为策动云南护国起义的当事人，其回忆文章的发表时间，距离护国起义及袁世凯死亡时间仅半年左右，其可信度毋庸置疑。^[1]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吕志伊先生正是利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形式，用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来策动这些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的同志发动护国战争的。不管有没有履行加入中国国民党或者中华革命党的手续，他们都还是中国同盟会忠实的会员，在思想意识上始终视中国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先生马首是瞻，矢志不渝。在孙中山倡导和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受到毁灭威胁的危急时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努力开拓政治、军事工作局面。或利用合法身份，“整理军备，互相提挈，秣马厉兵，有备无患”；或潜伏于要冲，默默耕耘，积蓄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党人可以依仗的中坚力量，是“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的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力量，随时听从革命领袖的指挥。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加入同盟会、时任云南将军的唐继尧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唐继尧对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和一系列帝制自为的复辟活动早已痛心疾首，积极酝酿反袁斗争，不断派人与海内外革命党人联络。1915年10月，唐继尧上书孙中山，请他主持全国的讨袁斗争。信中说：

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荼毒人民。我公以旋转乾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勋，革除专制，还我民权。方谓永享共和，与欧美各先进国并驾齐驱，胥世界于文明。乃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欲行帝制，举国靡靡，谁敢抗颜？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厉兵秣马，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共视息。然而，云南地瘠民贫，兵单饷绌。长沙子弟，虽仗义以先来，澧水师干，等孤注一掷。所幸四方豪杰，具有同心。兹特派唐萍麋、李伯英二人代表驻沪，秘与各方面同志周旋接洽，或翼将伯之援，或为钟鼓之应，或拔戟以共锄渠魁，或解囊而乐输义粟。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慙，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骥尾窃附，伫听佳音。^[2]

由此可见，唐继尧在护国战争发动前夕，就认为民主共和国家是孙中山“我公以旋转乾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功”而建立的。护国战争以“革除专制，还我民权”的思想为旗帜，表明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无人替代的作用，“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一语则清晰表明唐继尧所领导的云南护国军的属从地位。这样一篇对革命领袖充满崇敬，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深刻认同，为民主共和国家而战的激情报告，无疑是唐继尧民主共和思想的根源，发动护国战争的动机和出发点。

据《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等典籍统计，1915至1921年间，正值护国战争前夕至护国运动方兴未艾的期间，唐继尧致孙中山函电，约有200余件，函电内容均为请示工作，商讨机宜等，是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选择和斗争策略的需要，绝非敷衍、虚饰之言。所有

函电均以尊崇孙中山先生为革命领袖，口吻语气都十分恭敬，一以贯之，长达数十年，这是装不出来的。

史学者不应该遗忘黄兴军事班底的作用。孙中山与黄兴因为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中国同盟会几乎走到崩溃边缘，但是在倒袁护国的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云南唐继尧、广东郑开文、四川熊克武等人都属于“黄兴军事班底”最为忠实的成员，在袁世凯白色恐怖下隐藏下来，成为反袁并筹备护国起义的中坚力量。

黄兴计划护国讨袁，对云南的关注、发动最有力。黄兴一方面致电孙中山，表示在未来的反袁战争中，极愿效力。另一方面派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张孝准，与蔡锷“密取联系，相助进行”。1915年9月，黄兴接蔡锷将赴西南密信：

九月底，松坡先生专人送来一封密信给先君。这封信长达十七页，其中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先君的意见。先君接信之后，经过仔细研究分析，断定袁世凯必然要实现他的称帝野心，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凭借松坡先生辛亥前后在云南积蓄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于是，一面计划在美筹款讨袁，作经济上的支援；一面嘱我立即动身回日本，以便与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临行时，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先生，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

蔡锷秘密抵日本，在黄兴所派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前往云南。黄一欧回忆：

蔡锷密派殷承瓚来，说他不久将过倭地赴云南，但请设法避去倭新闻记者与袁探的耳目。我与张孝准、杨源睿等届时在门司‘山东丸’船上迎着蔡锷，设法满足了此项要求。他便安全通过倭地，经香港、安南达到目的地。蔡将军之渡日，张君迎之于长崎。蔡将军实自门司上陆，潜居神户。后由神户上船，经沪赴港。其实情至今世人尚不多知。之所以保全秘密者，皆张君计划周密之所致。

护国战争爆发前夕，黄兴电催李烈钧等人滇，参与护国起义，断言护国战争必胜。他还说：“蔡君（锷）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他不仅在海外筹集巨额款项汇回国内，支援反袁战争，还认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通电全国，号召协力策进，务除祸本。关键时刻，黄兴电促与西南关系较深的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大业。黄兴催促陆荣廷讨伐袁世凯电文说：（1915年12月22日）

今袁逆谋叛民国，公然称帝。不信、不忠，不仁、不义，人痛恨，外邦非议，内援外助，具已断绝，此其自亡之日也。弟知足下承富爱国之热忱，且智勇冠绝一时，临兹事变，必有宏谋伟略，百倍于弟之所期。所以不辞瓶缕渎陈于足下者，亦不外拳拳敬恭之意。今者海内贤豪，竭智并力，以正义讨昏暴，以人民公意诛独夫，义正言顺，内结国内之人心，外博世界之同情，事之成功，不难逆睹。望足下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发扬奋迅，激励国民之气，无使时机坐失，贼势日展，则国家之福，亦足下之所赐也。

唐继尧与中国同盟会军事领袖黄兴的关系，同样是充满崇敬、仰仗依赖之情。在云南宣布独立的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致电黄兴，告以云南宣布独立，誓师讨袁。曰：

侯公到滇，藉详伟魁，至为钦佩。滇南军民，慨国基之陆危，义愤填胸，已于本月二十五日由尧率领全省健儿，宣布讨逆，勉为前驱。……国人景仰高山，已非一日。尚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共和前途，实利赖之。^[3]

黄兴致电唐继尧指示曰：“袁世凯废共和，行帝制，中国必立起革命，声讨其罪。此时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随革命军同事疆场，竭尽吾最后之气力，驱逐国贼，另举贤能，保全国民，使吾国人得共享自由共和政体之益。中国五千年来，至今乃得改为共和政体，国民始得享自由幸福，吾国民断不能坐视袁氏任意复行帝制。”

护国战争前夕，黄兴指示李烈钧、李根源、程潜、熊克武、方声涛、但懋辛等人回国联络同志，发动武装斗争。黄兴1915年11月26日《致张孝准书》，曰：

……总之，此间除款事外，无能相助，一有所得，当即电汇，以应急需也。鄙见所及一二，笔之于左，请达同人采择为幸。一、发难须急，缓则狡猿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一、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所主张之滇、粤均可。因割据一二省，响应必起，猿贼财政，即生缺陷，此可制猿之死命（此节于致行严兄函详之，请一阅）。一、广设暗杀机关，造起种种恐慌，此节兄等已实行。惟须连发；不论大小强弱（小弱者更易为力）。昨郑汝成一（死），最快人心者也。北方更须注意，其赞成帝制各机关，破灭之，亦有效。一、冯某未尽可靠，当有先防之心。若能得彼部下之同情，即急起拥戴之，彼亦无所逃。然须知彼非如程德全之易与，更须防如程德全之反复。一、陆氏一武夫，以部下激发之自易。以大势观之，此间或可先发（滇能先发亦好，此处可以一电，脱离中央，自成独立民国）。一、外交绝不必先有所顾虑，以起与不起，利害均相等，惟须尽力图之。^[4]

钮永建回忆说：“民四春间，以帝制渐露，由英伦道美洲，特访克强于费城，有所计划。克强以民党分裂，宜速筹和解，嘱永建急回国图挽救。并赠美金三百，促之行。翌日，永建遂首途过纽约桑港，迭与林子超、冯自由商党内调和事。……时方十一月初，李君印泉，蔡君松坡、李君协和，熊君锦帆先后至，闻之甚喜。松坡、协和、锦帆赴滇，永建亦回沪，于舟中作书至费城报告克强，屈指计之，当在克强发此信前也。既而诸计划均可实行，袁氏帝制竟以失败。”

由此可见，黄兴事实上起着革命派与立宪派、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桥梁纽带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第三节 护国战争是中国同盟会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成功范例

孙中山、黄兴的斗争策略和具体指示，是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走在正确轨道的基本保证。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义揭开护国战争序幕，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为主要目标，其核心问题是要维护辛亥革命在中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因此，可以说，护国战争是护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护国运动高潮迭起的表现，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动武装革命战争又一成功案例。笔者认为：其一，云南发起护国战争的旗帜鲜明：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王朝、帝制自为，恢复民

主共和的国家体制，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制度，即护卫孙中山创建的共和政体。从云南护国战争的进程来看，唐继尧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政治纲领，犹如辛亥革命期间武昌起义一样，在特定的区域内，由于革命党人长期努力开展政治思想宣传、灌输和组织工作，积蓄革命力量。时机成熟时，突然爆发，一举制敌，起义成功后，才利用各种途径、方式向同盟会总部报告。并迅速扩大影响，取得各地革命力量的增援，从而使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取得护国起义的伟大胜利。

云南在特定的条件下，快速发动护国战争，占领战略要地、城镇后即建立革命临时政权军都督府，形成革命军以交战团体的身份进行外交活动，以便扩大影响和取得道义、舆论、武器装备、资金的支持。宣布起义前后发动广泛的政治宣传，派出人员与省外、国外的革命力量进行密切联络，利用函电等各种形式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系，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带动周围地区的武装起义。派出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到贵州、四川。派出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到广西、广东，以军事实力支援和促进这些省份的武装起义，并建立独立省份的防御和攻击防线范围。这些措施的采用，与云南“重九起义”后的军事、政治策略都具有相似性，受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指引甚为明显，只不过规模更大，影响更深。

其二，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组织形式，以中国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为指引，宣布起义后，即建立云南省军都督府。蔡锷于1916年1月5日致梁启超信函中亦曾提到这些安排：“现决以其留守，锷出征，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护国战争首义之际，没有采用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把云南首义摆在最高位置的“大元帅府”建议，表现出虚位以待革命领袖的莅临和予以各省起义军平等地位的政治智慧。唐继尧不以领导者自居，即便是护国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亦不以功高自傲，始终把护国战争置于孙中山领导之下。护国军兴时，他上书孙先生：“……一切机宜，听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慙，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骥尾窃附，伫听佳音。”1916年5月11日，当唐继尧得知孙中山先生已经归国，兴奋不已，致电孙中山先生曰：孙中山先生鉴：奉电欣悉返国，曷胜欣喜。元恶未除，群凶四伏，万方多难，端赖老成，尚望赐教，以匡不逮。翹首沪，无任神驰。唐继尧叩。真。印。^[5]尔后，孙中山先生函复李宗黄（唐继尧派出的联络人员），对唐继尧首倡云南义举和采取的策略、方法，表示十分赞赏：“唐公命世之材，首倡举义，处以撝谦，诚可以为全国军人之表率。”

其三、唐继尧对云南护国首义的杰出贡献。1915年初，当袁世凯刚开始同日本政府谈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唐继尧便意识到日本“视我为第二朝鲜更无疑义”的狼子野心，于2月25日向西南各省发出通电，建议西南各省“整理军备，互相提挈，秣马厉兵，有备无患”：

（衔略）欧战发生，倭奴狡启，攻陷青岛以来，野心几不可遏。始则暗助逆谋，图收渔利。计不获逞，遂复提出种种条件，妄肆要挟。虽未经宣布内容，然其视我（为）第二朝鲜更无疑义。中央近日交涉，有无进步，不可得知，万一决裂，如何对待？长江下游兵力虽厚，惟是盈盈一水，门户洞开。欲为中央后援，端在西南各省。尧等才疏力薄，筹划无方。惟谊切同仇，诚不敢以本省械缺兵单，遂意除戒。窃念我湘、鄂、川、粤、桂、黔、滇各省，相依车辅，同处漏舟，诸公慷慨澄清，为国柱石，自必有荃蕀硕划，定倾扶危。近日，军备作何计划，内部作何整理，尚希

示我周行，互相提挈。念唇齿之无寒，亦犄角之共恃。若能徙薪曲突，上兵伐谋，匕鬯无惊，如天之福。否则秣马厉兵，有备无患，龙骧麟振，师克在和。尧等不敏，窃愿执鞭以随。临电神驰，聆闻明教。^[6]

唐继尧“秣马厉兵，有备无患，龙骧麟振，师克在和”的想法并非说说而已，早在筹安会出现之前，就开始为护国战争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唐继尧在1915年的工作日程的大概有以下安排：1月，同杨（慕）、邓（泰中）秘谈，令杨慕等加紧训练军队，与蔡锷等秘密联络。2月，保护吕志伊等同盟会成员进入云南。编制了以袁世凯北洋军队为假想敌的作战方案。3月，成立军械局，集中州县枪支进行整修。4—5月，筹措作战经费，派吕志伊到南洋募捐。7—8月，分批派出密使，与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陕西陈树藩、山西阎锡山、新疆杨增新等联络，达成了同时起义或相机响应起义的秘密协定（后来阎锡山和杨增新违背了协议）。9月，研究并原则决定了起义时机的四个条件，即中原各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中有一可望响应时；国民党及海外接济饷糈时，“如上三条都不能实现，则为维护云南本省人格计，亦应孤注一掷”。10月，上书孙中山请求帮助贵州装备王文华旅，向日、德商人购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医疗器械。在港、沪设立反袁联络接待站。11月，制定了以军事政治并举，三路出师，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的护国起义的战略。12月19日前后，秘密接纳李烈钧、熊克武、蔡锷等大批革命人士到滇。23日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25日正式举行起义。蔡锷1915年12月19日抵达昆明时，曾不胜惊喜地说“真正出乎我的意外，你们已经样样都准备好了！”

蔡锷在唐继尧千方百计保护下，来到昆明后的十几天里，他们在一起共商护国起义各项大政方针，共同发起讨袁各种重大举动，互相谦让以承当斗争需要的重要职务，他对唐继尧为此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了解的。可是，护国起义10天后的1916年1月5日，蔡锷在给他的恩师梁启超的一封信函中却这样说：“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慕、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其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冀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况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荏苒数月，莫得要领。”说了些极力贬低唐继尧，吹捧自己及梁启超的“吾侪之意”，真正“莫得要领”矣。

事实上，唐继尧在9至11月上旬这段时里，三次召集中级以上军事干部开会酝酿反袁计策，准备“则为维护云南本省人格计，亦应孤注一掷”，就不是“一意稳静”的动作。护国战争的发动，需要一个合适的“窗口期”——当袁世凯称帝亮相登场，国内外舆论哗然，民众愤怒、痛恨发酵沸腾时，特别重要的是各方面反袁力量完成聚集，各种战争物资收集到位。唯有表面上的稳静，暗中进行紧锣密鼓、踏踏实实的各项准备工作，才有可能在关键时刻，予以袁世凯致命一击。

蔡锷到达昆明十天前的12月9日，唐继尧就派出邓泰中、杨慕率领的滇军步兵第一、第七两个团（后改称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第二支队），以剿匪为由，秘密开拔至滇川边界。蔡锷到达昆明的12月19日，邓泰中的步一团，就抢占盐津县的老鸦滩高地，开始同袁世凯的军队小规模交火了。1916年1月5日，即云南正式宣布护国起义后的第十天，蔡锷给梁启超的信中，披露了滇军先遣队抵达川境的情况：

……军事部署，悉如在京时所议。惟军队分驻地相距辽远，交通复极不便，动员集中，极为

濡滞。现第一梯团五日内可达昭通（距省十三站），其前锋已将川边之燕子坡（为滇师入川要隘。系川境，距昭通十站，距叙州三站）占领，第二梯团日内由省出发，俟抵毕节（为滇黔蜀用兵必争之地，距滇垣约十三站）后，相机进行。第三梯团须元宵后可集中省会，预计非二月中旬不能抵川境。……锔拟于一星期后出发，所部兵力虽不厚，亦应早发，以作士气而促进行。

蔡锔在此信函中已经明确“现第一梯团五日内可达昭通，其前锋已将川边之燕子坡占领。”这个第一梯队先锋就是12月9日唐继尧派出邓泰中、杨慕的滇军步兵第一、第七两个团（后改称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第二支队），而蔡锔率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部从昆明出发的时间是1916年1月16日。

1916年1月24日，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刘云峰报告所部攻占叙州经过情形电：

急。滇都督，行营总司令蔡钧鉴：本部抵昭，即督两支队兼程前进，本月（即一月）十六日，一二两支队先后行抵滇、川交界之新场地面。十七日晨，我军在新场与敌军接战，节次进攻，敌军当之辄溃，进至燕子坡，敌人凭山列阵，一支队攻仰（仰攻）移时，敌不稍却。旋命二支队绕道许堰突击敌军后路，敌军不支，弃山逃遁。我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由黄抛耳、凤来场直至捧印村俱被占领。十八日晨，一二支队由捧印村先后进攻，午后二时，一支队抵横江附近之黄栗堡。查此地左右崇山，路径崎岖，敌人一支队抵横江附避之黄栗堡。查此地左右崇出，路径崎岖，敌人以机关枪、大炮罗直（置）两山，意在包围我军，附击制胜。我军一支队突入山峡，敌军枪炮左右注射，弹下如雨。我军奋勇支撑，冒死争山，预（予）命二支队乘夜出其不备，绕出右翼，以蹶敌后，由山后振臂一呼，冲至山顶，敌军奔溃下山，我军乘势仰击，遂获全胜。左翼敌军亦闻风惊溃，枪毙逆官三人，杀伤敌兵约百人，夺获大炮一门，机关枪一架，一路追袭，直至横江，敌始夺船奔北。十九日，我军直捣安边，查安边地控金江，左右两山对峙，敌人高据左山，阻绝江路，一支队据右山，以大炮牵制敌军。云峰当率二支队绕道罗东，越金江袭攻山后，约下午三点半钟，敌人方隔江射击，云峰亲率二支队蜂拥登山，直贯敌背，敌军前后无路，困兽死斗，左右荡决，拼命力击，战至夜分，敌军大溃。击毙敌军营长戴鸿智，杀伤敌兵、抢获军械无算。自此一蹶，胆为之落。驻叙敌军弃城远遁，我军遂于二十一占领叙城。统计叙南大小数战，我军死伤合计仅二十余人。谨驰露布以闻。云峰叩。敬。印。^[7]

1916年2月8日，护国军第一军司令官蔡锔在永宁报告滇军第一梯团第一、第二支队（即邓泰中、杨慕部）作战情况：

滇唐都督鉴：据杨支队差遣员由叙到永面称：阳历十九日，邓支队破北军四百人于黄泡咀。二十日，杨支队破敌人七百人于横江。二十一日，邓队攻安边场，杨队往横江。二十二日晨，克安边，毙敌军七十馀，投河死者无算，我死十馀人，伤二十余人。二十六日，邓队开赴宗场，二十七日，与北兵四百、川兵六百战于斗午岩。三十日，杨队开赴白沙场，与敌遇；敌兵约五千馀，鏖战两日夜。三十一日，邓队敌于宗场，敌兵死伤四百馀人。二月一日，杨队又破之于白沙场，毙敌千馀人。敌纵火烧民舍数百，向南溪溃退。旅长伍逆，负创奔走。冯逆顺流东窜。计捕获北兵百馀，持械投降者，北军汉军计六百馀。我军伤亡共数十人。是役，逆军由泸州、自流井、犍为分道大举犯叙，兵数近万。陈逆悬赏四十万，期在必克。宗场、白沙场既败，泸州、自流井两

路逆军，已溃散不能成军。犍为军至屏山，亦逡巡不进。我军已派队往攻。叙、泸之敌兵已尽，我军援应可通。经此一役，驻川北兵三旅，已去其二。请即抽调昭属警备队或新招兵队赴叙，以厚兵力。至禱。鐸。庚（1916年2月8日）。^[8]

从敌对方往来电文也可确定滇军第一梯团一、二支队邓泰中、杨慕部在1916年1月底前作战情况。时任四川都督、四川防军总司令陈宦为云南护国军攻占安边场宜宾危急请速催援军密电（1916年1月20日）

特。统率办事处钧鉴：觧密。据伍祥桢效电称：我军自横沱（江）失利，退守安边场，距城仅九十里，在该场与敌死力坚持一昼夜，猛敌炮既多且猛，我军伤亡甚众，遂退出安边场，宜城危在旦夕。余留之步四排、炮一排已戒备战斗。等语。查刘延杰援叙之兵筱夜出发，今日可到。冯旅率先行混成一营，予巧晚抵泸，亦已飞电飭令星驰赴叙。拟恳电催曹军之到渝者速开赴叙，并飭桂军暨入黔军队速进，为禱。先谨闻。敬乞代奏。宦叩。号。印。^[9]

综合上述各方电文内容，可以确定1915年12月9日出发的邓、杨两团，原为唐继尧的警卫团，每团约有千余人。乃是滇军精锐，编制足满，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骁勇善战。作为护国军先锋队，邓、杨两团按照唐继尧的原定部署，奇袭叙府、泸州，取得了护国战争史上有标志性意义、震撼全国的第一个胜利——“叙泸大捷”。可见，师出正义，克敌于先机，唐继尧“举措计划，缜密恢廓，不动则已，动则必操胜算”的谋略筹划并非“莫得要领”。

需要特别强调提出的一件史实是，唐继尧坚决反袁护国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坚持要把护国战争进行到底的行动上。1916年3月22日，当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和护国军奋力抗争下，使出了“取消帝制，反踞总统”的政治手段，乃命段祺瑞组阁，与护国军停战议和。包括梁启超、蔡锷在内的反袁派人士认为袁世凯已经发布“罪己诏”，护国起义目的已经达到，急欲与袁世凯开展停火、谈判，希图在袁政府的框架下重新构建政权机构，表现出急于收网渔利的态势。唐继尧力排妥协派的意见，根据孙中山先生《讨袁宣言》“以为袁氏若存，国将不保；吾人既主讨贼，而一蹶不振，非只暴弃，其于谋国亦不忠。故亟图积极进行之计，辄与诸同志谋之……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返兵。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之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未俗争权夺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10]的精神，发表了《袁氏必须退位通电》，提出“要袁世凯立即退位，听候审判。由副总统黎元洪按民初制定的《临时约法》规定，正式‘继任’大总统职位。恢复袁氏非法解散之国会，重谋国事”的要求。随后，唐继尧拍板提出公布袁世凯十九大罪状，公开加以审判，剥夺其公民权利，没收其全部家产，驱逐出国的决议。在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唐继尧马上致电中央，并提出四项主张：一、恢复旧约法；二、召集旧国会；三、改组正式内阁；四、召开全国军事善后会议。

唐继尧的上述行动，充分印证了那段历史时期中，他确实具有反袁、爱国、捍卫共和国体的思想，其反袁护国之义举完全出于一个中国同盟会会员的爱国主义和民主共和理念的动机和公心的自觉行为，并非受人逼迫或者被潮流裹挟。在关系到民主共和政体危亡时刻，在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不对等的现实环境下，这些策略的采用是取得护国战争胜利的正确选择，与孙中山先生护国战略完全一致。以往一些史学者把孙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唐继尧的意见分歧或行事方式的乖离，就全盘否定唐继尧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奉行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高举捍卫共和国体的旗帜，发动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专制倒退的护国战争，并取得辉煌战果的历史功绩，这是不客观的。

1916年11月唐继尧在云南各界追悼蔡锷的大会说：“云南起义系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吾滇自主为之。外间不察，有谓松坡为主动，云南为被动。其实吾滇尚未起义之前，孙先生迭派董福开及吕志伊前来滇。起义后，本人即派李宗黄赴沪，请示机宜，正直主动者系孙先生，我与松坡均系奉公承教。”^[11]护国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先生在回答护国谁为主动的问题时也有这样的表述：“干大事者，耻言功利，但是非真假不可不明，唐如不是主动，他就不容许我进去，即进去，他可以把我们将献于袁氏，立刻可以封王。唐如不早有决心，不早作准备，我们进去一周，即行布露讨袁，演一出戏也演不出，天下哪有这种容易之事？虽愚鲁之人亦可以判断，我与松坡，不过远道赴义。帮同做一件大事。若论主动或论功当然唐主动为首功，松坡次之，我个人实无功绩可言。”

作为护国战争主要当事人唐继尧、李烈钧当年的表述，应该是护国战争的发动和其时中国各政治力量、党派、人士的共同作用、贡献的一个结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为代表的爱国军人，在全国人民反袁护国浪潮的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联合发动了护国战争，但是主次分明。唐继尧对护国战争领导权“正直主动者系孙先生，我与松坡均系奉公承教”的表达，说明护国战争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其民主共和思想、实践的伟大号召力和中国同盟会强大组织与动员能力，才是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主次关系，符合历史真实面貌。

由此论及，以云南宣布护国首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的继续，属于全国护国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多年宣传、组织反袁斗争的总汇合，是开展对袁世凯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高潮阶段。亦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把实行民主共和国家体制的思想在海内外中国人中广泛传播、辛勤培育的革命种子发出的芽，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孙中山在致电北京政府以云南首义作为国庆纪念的电文中，对云南护国首义的功绩，对唐继尧暨起事诸人以懋赏的提议，充分肯定了云南护国起义为国民中兴之业，可以认为是护国战争的一个无有争议的定论：

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民方想望太平，不图秉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国民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

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彰勤劳，昭示来兹。^[12]

当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政党和领袖人物关系的思想来分析，护国战争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云南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归功于那些不惧流血牺牲、奋勇作战的第一线官兵们。但是，唐继尧顺应历史潮流，在启发、组织、领导云南人民共同发动了伟大的护国战争，并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取得胜利，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其功不可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分属进步党、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蔡锷出于政治斗争和党派利益的需要，颇有算计。在护国战争发起的主动或被动问题上有过纠结，有过失言，说了谎话的。梁启超说：“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康有为则云：“云南起义，吾令梁启超为之。”蔡将军则更进一步说：“护国之役，锷实董率之。”（蔡锷《大洲驿刻崖记功碑》）不但把护国战争的发动、领导、指挥以及董成之功，都记在了自己功劳簿上。由于梁启超和蔡将军在当时名气较大，特别是梁启超的文名甚噪，唐继尧又身在交通、信息落后的昆明，且“耻于言功”，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就信以为真，引以为据。云南李宗黄先生是护国战争期间唐继尧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人，何不听听他的愤怒抨击：“致令吾党同志，三迤健儿，牺牲流血者，含冤莫白，天下不平之事，孰有甚于此乎！然贪天之功事小，祸国之罪事大，文人无行，政客无信，腐儒误国，千古同调，事实胜于雄辩，作伪心劳日拙，予于梁氏，又何言哉。”^[13]

以上叙述，笔者无意贬低蔡锷将军在护国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但是在回顾历史真相时，我们必须在已有的历史材料方面予以正确的阐述，充分肯定蔡锷将军在民国危难时刻的杰出贡献，肯定护国战争首义人物唐继尧的功绩。更应该看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既联合反袁，又有党派争夺护国战争领导权、攘夺国家权力的内涵，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情况。

有些话不方便多说啦，尚有兴趣深究此议题者，建议读读李书城先生1916年7月28日、8月1日致曾继梧电文：“克公（黄兴）难得中央任命，组庵亦不易办到。梁派始主张戴戡，经在沪湘人反对，现又主张松坡。恐松坡希望较多。静仁、行严、伯兰等已赴京，相约：为克不成，竭力为阻。如均不成，属之松坡，尚是好结果。”“湘事波折甚多，皆因中央别有用意，兼之熊、梁弄鬼。”^[14]上述电文表达的护国战争胜利后，各派政治人物哄抢国家权力的核心机密，诸君阅后感觉何如？

第四节 郑开文在广东参加护国战争的过程和作用

1913年夏秋短短的几个月里，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赣、苏、粤、闽、川相继败北，拥有东南半壁的国民党人，元气大伤，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果实丧失殆尽，革命党人濒于绝望之地。此役之后，袁世凯采取种种极端手段，妄图趁势扑灭革命余烬，一时间，缉捕党人的通电交驰南北，白色恐怖蔓延全国。讨伐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偃旗息鼓，四散亡命，领军人物中逃到日本的，就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熊克武等百余人。没能及时逃脱者，向袁政府屈膝投诚者有之，曲意隐忍以图东山再起者有之，躲到租界里做寓公者有之，卸任归田不问政治者有之，都不足为怪。令人欣慰的是，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高级将领郑开文却因“征库”事件转战于沙漠戈壁，消息隔绝，避过了风潮，还因抗击外族侵略的劳绩，进入广东龙济光军事集团并委以重任，就此

潜伏于敌方阵营，成为革命党在广东的重要力量，这更是偶然中的偶然，不幸中的侥幸了。

护国战争发动前夕，黄兴与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欧事研究会”成员钮永健、张孝准、李根源等人频密联络，密切注视着国内反袁运动的形势变化，对张孝准，李根源等人反映的情况，黄兴都一一予以具体指示，遂认为广东革命党人业已运动成熟，具备发动起义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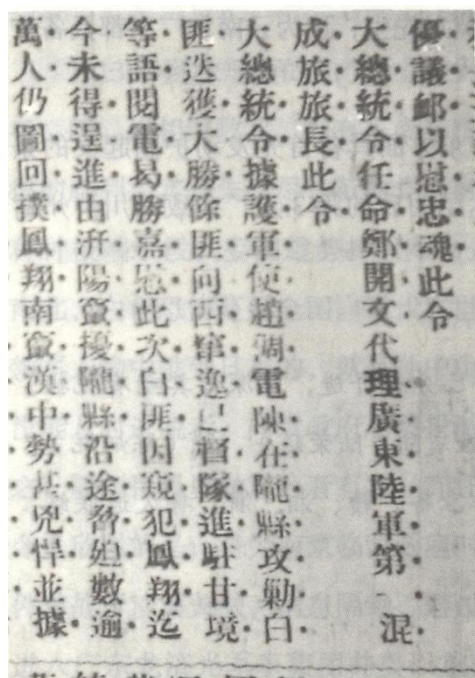
鄙见所及一二，笔之于左，请达同人采择为幸。一、发难须急，缓则狡猿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一、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李根源）所主张之滇、粤均可。因割据一二省，响应必起，猿贼财政，即生缺陷，此可制猿之死命。^[15]

此函表明，彼时身在美国费城的黄兴先生，认为云南和广东都具备首先发难、发动护国战争的条件。

无独有偶，蔡锷也有函电谈到广东方面具备首先发动护国起义的条件。1915年12月21日，即蔡锷到达昆明后的第3天，在致四川泸州雷飙旅长的电文中谈到：

……（护国起义）一切计划，早已分途并进，且深信其确有把握，较之辛亥之役，或尤易易。现各省如桂省陆（陆荣廷）、陈（陈炳焜），宁省冯（冯国璋），早已决心，业作准备。赣、湘、浙、鲁久通联络，已得赞可。粤省党人运动，亦已成熟。^[16]

作为蔡锷赖以发动护国战争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这封电文中，定调了这几部分力量所处的地位和成熟程度：广西都督陆荣廷、师长陈炳焜和江苏都督冯国璋早已决心，业作准备。江西、湖南、浙江、山东处于“久通联系”，并在口头上“已得赞可”。唯有广东，蔡锷的语气相当肯定，“粤省党人运动，亦已成熟。”



《义声报》刊载郑开文代理广东第一混成旅旅长消息（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不无巧合的是，身在昆明的唐继尧还有更明确的说法。1916年1月，唐继尧、蔡锷等《致在粤滇籍将士书》中，确认广东已经组织护国军：

……粤东将士，现已组织护国军，刻期举事。继尧等迭与往返函商，滇籍将士，如有首先援应者，粤军总司令长官自当分别给奖。其好意中立者，亦不横加诛戮，已过事迹，概不追求。

上列函电表明，广东方面革命党人与黄兴、蔡锷、唐继尧等均有畅通的联系渠道，汇报工作或商讨策划发动护国战争的各项准备，以至于黄兴、蔡锷、唐继尧等军政领袖都认为广东革命党人业已运动成熟、具备发动起义的条件，业已组织“广东护国军”，推举“滇籍粤军总司令”，那么，“继尧等迭与往返函商”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纵观当时在粤的滇籍权势人物，时任广东都督龙济光、广惠镇守使龙觐光属滇籍，最有可能是“滇籍粤军总司令”。但，龙济光弟兄肯定不是革命党人，而且是革命党人最为凶恶的敌人：“龙氏在粤，于今三载，与党人深种仇恨，且部下之中将少将，勋位勋章，何一非党人之血肉，冰炭水火，岂可相容。”除了龙济光昆仲外，时在广东军界职务最高，并且有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身份，且与蔡锷、唐继尧等人有电台频密联络的人，非郑开文莫属。

1915年8月20日，时在北京的蔡锷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南方各省军政要员的电文，其中广东省有三人是蔡锷通联的对象，除广东龙将军（龙济光）、龙镇守使（龙觐光）外，便是郑旅长（郑开文），即可认为蔡锷与广东方面联络的核心成员就是郑开文。

又据1916年初，云南方面调查在粤滇籍军官人员名册时，列表中仅有郑开文一人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即唯有郑开文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黄兴，云南著名将领蔡锷、唐继尧等人相交相识并共事久远，才可能是“广东革命党人业已运动成熟，具备发动起义的条件”的唯一人选。

广东特殊的地理、经济、政治地位，在当时中国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袁世凯与反袁势力双方必争之地。以民国1915年人口统计佐证，云南省人口为1200万，贵州省人口为800万，广西省（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为500万，三省人口之和约2500万，而广东省人口统计则有3200万。广东省1916年财税收人为3818.7万元，云南省1916年的财税收人为572.3万元，不足广东的七分之一。所以，广东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财赋税收区，能否被南方护国军势力所利用，某种程度上成为护国战争物资、军火军饷主要来源地，争取国外援助的通道，其战略地位、作用的重要性是其他西南各省不具备的。

说到广东民初的政局，不得不说到龙济光，也不得不说龙济光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生态里的一朵“奇葩”。龙济光何许人也？他并非广东籍，也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而是地道云南人。龙济光，云南蒙自人，彝族土司出身，后成为清军将领。1907年12月任龙州兵备道时，配合陆荣廷部，镇压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黄明堂等举行的镇南关起义，被擢升为广西提督。1908年，率南宁防营，镇压革命党人黄兴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事毕，岑春煊奏准清政府将其部编为巡防营三十营，称为济军。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任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独立后，都督胡汉民为防止济军生事，将龙济光调任高廉雷琼宣抚使。其后，陈炯明又将济军调往梧州，使这支专事镇压革命的军队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二次革命时，1913年8月11日，龙济光率济军3000人及桂军3个营进占广州，与驻守观音山、都督府的讨袁军发生激战。13日晨，济军发动总攻，讨袁军溃败，粤军被解散（李福林、魏邦平两部仍保留），济军大肆抢掠造币厂及财政税收机关，仅造币厂即损失白银406390两。不久，龙济光又将济军各部大加扩编，以龙觐光为第一师师长兼海军司令，下辖2个旅。马存发、段尔源分任第一、第二混成旅旅长。王纯良任高雷镇守使，10月

14日黄恩赐任虎门要塞司令（此四人被称之龙军的“四大天王”）。并以贺文彪、潘斯凯、陆兰清、关国雄、梁永槃、李次皋、陈福祥、李炳荣、徐连胜等为统领，袁带为护沙统领兼护商（航渡商人）统领。包括福军司令李福林的福军等约共有60余营（每营官兵300余名）。肇军李耀汉部也扩编为15个营。此外还有江防司令部所辖的若干小舰，是为龙济光入粤后扩编军队的情况。龙济光治粤期间，充当袁世凯的爪牙，大肆镇压革命党人和残酷统治广东人民，在经济上横征暴敛，肆意勒索。当时的报纸揭露“全粤九十四县无一人不受其祸，无一处不遭其灾”。其杀人之多，“比诸前清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湖南之汤屠户（汤芑铭）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广东“三千余万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一人不痛恨龙氏者”。

民国初期，广东军政首领龙济光弟兄成为袁世凯的死党，其统治的“济军”几乎是铁板一块，外部力量很难打入。据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档案披露：“惟广东完全势力，尚在龙氏掌中，蒂固根深绝非易与。龙氏即拥重兵，诘难贿通其部下”。郑开文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叶成林曾有《记龙济光杀李万祥》一文流传于世，揭露龙济光在辛亥革命前对待其内部革命党人的残酷手段：

我与李万祥（李万祥，云南建水人，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商量，上书龙济光劝其反正。因李万祥文化较低，由我执笔。书成，两人盖章后，同到龙济光处，准备面谈一切。我两人到达龙处，呈上手本，同到客厅候传。李万祥先被传见，去不多时，我即目覩传李万祥的听差携麻索入内。我问听差要麻索何用，他说，拿去捆协统李万祥。我闻之骇极，即将指挥刀解下置于客厅，向外奔出。^[17]

由此文可见，龙济光对革命党人如此残忍，要在其内部掺沙子、宣传革命，培植革命势力，绝非易事。

笔者查阅到1914年4月23日，经时任中华民国海陆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蔡锷和云南都督唐继尧推荐，把刚从新疆归来的郑开文运作到广东，被袁世凯任命为代理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这个被外界看似不经意的一次正常调动，蕴含着西南军事力量向外伸展的契机，是蔡锷、唐继尧、郑开文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精彩布局。在龙济光势力范围内，打进楔子，分化瓦解龙济光军事集团，或利用其力量与革命党人互相提挈，与袁世凯势力成犄角之势，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在必举的重要策略，可达到其“上兵伐谋，匕鬯无惊，如天之福”的效果。

是时，唐继尧、蔡锷的分析判断没有错，能够楔入广东势力范围的机会千载难逢，唯一合适且为袁世凯、龙济光能够接受的人选非郑开文莫属。对于郑开文，龙济光早就知道其同盟会骨干身份，知道郑开文曾任陆军部高官，表明郑开文在同盟会的政治地位非同一般。出于对郑开文的军事才能特别是军事教育方面突出能力的借重，期望能通过郑开文来改变以抢劫杀戮闻名的济军，提高战斗力，以便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同时有借助郑开文的关系，搭建与党人联络桥梁的考虑。民国初年，政局风云突变、官位轮流更迭频仍，不为自己的将来盘算才是傻瓜。多个人脉多条路，脚踏两条船，风吹雨打都不怕，就是其时龙济光等旧满清官员变色龙心态的真实写照。如果说辛亥革命前，龙济光出于个人仕途的发展，利用蔡锷、郑开文等留日士官生的军事特长，为其编练新军，取悦朝廷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后崛起的革命党人，特别是握有军队实权的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郑开文等人，走上政治舞台，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文化私德，都出现前

所未有的新气象，成为民国政治生态里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龙济光虽不敢与他们走得太近，亦不可能如往昔自恃封疆大吏的身份去招惹他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郑开文赴任广东前与讲武堂将校班官佐的合影。左一为朱德，时任讲武学校教官。左三为郑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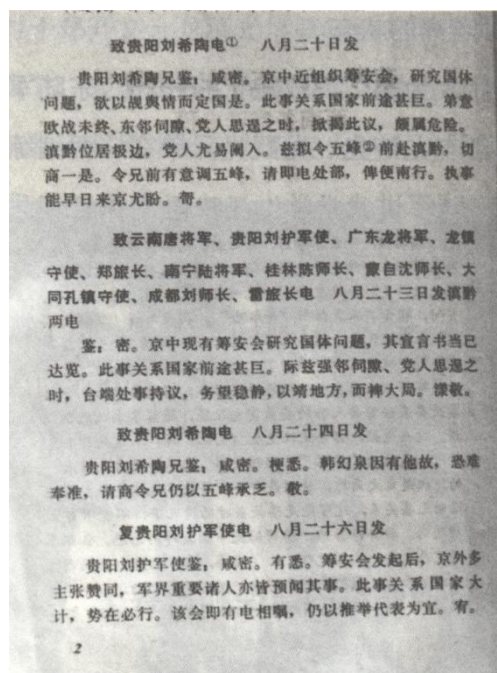
在任职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后改为第二混成旅）旅长和广东陆军模范团副团长之际，郑开文利用自己与龙济光、龙颢光兄弟在广西编练新军时就很熟悉的关系，先后将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江映枢[18]调任炮兵团副团长，调动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生孙明任第一混成旅参谋，逐渐谋划到一支自己掌控的部队，渗透到广东的军事政治格局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需要郑开文隐蔽行事，虚与委蛇，积蓄力量，伺机而动。其掌控的广东部分军事力量和行政资源，成为促使广东独立的重要力量，颇具传奇色彩。

第五节 郑开文与蔡锷秘密联络的途径和内容

纵观有护国战争论述的有关书籍报刊，发现史学家们选择性地淡漠了蔡锷在袁世凯政府里担任的一个重要职务——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这个统率办事处相当于满清政府的军机处，是袁世凯北洋政府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办事员亦相当于清朝时期的军机大臣，其实权甚至高于国防部长。1914年8月11日，云南《滇声报》登载的一份电文，有助于我们认识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职能划分和基本运作：

八大军区之计划。统率办事处采用八军区制，每区置总司令一，其下置左右副司令一。划分如下：第一军区直隶；第二军区奉天、吉林、黑龙江；第三军区山西、河南、山东；第四军区陕西、甘肃、新疆；第五军区湖南、湖北、江西；第六军区江苏、浙江、安徽；第七军区福建、广东、广西；第八军区云南、贵州、四川。至于军额如何分配尚未确定。

列为昭威将军之蔡锷，无疑就是第八军区的军事首领，分工负责西南三省的军事事务。1915年8月23日，时在北京的蔡锷将军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南方各省军政要员的密电，涉及多个省份的军政要员，明暗两面都是蔡锷相互联络，是其连为一体的人脉资源和势力范畴的具体表现，电报云：



蔡锷 1915 年 8 月 23 日在北京发给郑开文等西南军政人物的密电。转摘自《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致云南唐将军、贵阳刘护军使、广东龙将军、龙镇守使、郑旅长、南宁陆将军、桂林陈师长、蒙自沈师长、大同孔镇守使、成都刘师长、雷旅长电：八月二十三日发滇黔两电鉴：密。京中现有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其宣言书当已达览。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际兹强邻伺隙、党人思逞之时，台端处事持议，务望稳静，以靖地方，而裨大局。漾敬。[19]

此电文内容关乎重大，“京中现有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其宣言书当已达览。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际兹强邻伺隙、党人思逞之时，台端处事持议，务望稳静，以靖地方，而裨大局”，通报了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紧急情况，“欣揭此议，颇属危险”，预料国事将有巨大变化，提醒其主导的关系网、朋友圈做好应对的各方面准备。

电文相当简约，这可能是蔡锷处于当时的情况下，不能不有所隐晦、掩饰，也可能是某种特定的暗语。其中的人物背景：云南唐将军为唐继尧，时任云南省都督，地方实力派。贵阳刘护军使为刘显世，时任黔省护军使，为贵州省最高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广东龙将军为龙济光，时任广东省都督，地方实力派。龙镇守使为龙觐光，时任广惠镇守使，广东第一师师长，与其弟龙济光握有广东省军政资源。郑旅长为郑开文，时任广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师级编制，为陆军部直属，1915 年底，广东共有正规军第一师，第二师，第一混成旅）、广东省陆军模范团副团长，军队实权派。南宁陆将军为广西都督陆荣廷，地方实力派。桂林陈师长为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焜，军队实权派。蒙自沈师长为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沈汪度，军队实权派。大同孔镇守使为山西省大同镇守使孔庚，军队实权派。成都刘师长为四川师长刘存厚（时驻泸州），军队实权派。雷旅长为四川混成旅旅长雷飙，军队实权派。

蔡锷此密电联系的南方各省地方和军队实权人物，无疑就是蔡锷赖以发动护国战争的军事、政治资源的基本盘，是蔡锷谋划在西南地区与袁世凯争衡的“本钱”。郑开文以“广东郑旅长”名列其中，并列为广东省三大军事巨头之一，表明郑开文以特殊身份参与了蔡锷策动的军事、政治

联盟。从蔡锷在广西编练新军时期开始，郑开文就是其同盟者、结拜兄弟，有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此时成为广东军政大员，显然是蔡锷最可信托的在粤政治军事力量的代表。如果说，蔡锷对龙济光弟兄的竭力争取抱有试试看的成分，那么，其最后效果还是得依靠他的铁杆哥们郑开文的工作成果。

郑开文早有秘密电台与蔡锷相通，并各有专用的密电码。从几件郑、蔡间互通电文的情况来看，郑开文与蔡锷的密电码标识为：炳密，取郑开文的字“炳然”之“炳”，该密电码采用莫尔斯数码，每组拍发四个数字，代表一个相对应的汉字。笔者经过反复追索、对比，发现原北京天顺祥钱庄就是蔡锷在北京的秘密电台所在，因此可以确定郑开文与蔡锷间的电报联络已经采用无线电台的方式，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保密程度较高的通讯方式。而且，广东方面的收发报工作很可能是郑开文本人亲自操作，因为在民国元年的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役中，他已经熟练运用有线电报与丽江、昆明、北京、上海有关方面联络，互通信息或发起舆论战，上海《申报》刊登的“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就是证明。

天顺祥钱庄，全称为“天顺祥汇兑钱庄”，由清朝云南弥勒县商人王炽（字兴斋）创办，总号设于昆明，名曰“同庆丰”。重庆、汉口、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设有连锁经营机构，均称为某某（所在城市名称）天顺祥钱庄。天顺祥钱庄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极盛一时，其历史之悠久，营业之发达，信用之昭著，分布之广泛，在当时中国商界中首屈一指。凡提及王兴斋三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事迹亦为近期电影《钱王》所乐道。随着业务的发展，天顺祥陆续设立了重庆、北京、上海、汉口、江西等分庄，与官府、商场的票据来往日益增多，已由单一字号涉及票号、钱庄、盐业、茶业等金融服务业务，其中票号主要经营汇兑、盐岸、解协饷三方面的业务。在四川人李耀庭的主持下，天顺祥渝（重庆）号添办了滇边各盐岸，接洽官商各界，号局日盛。1902年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曾与李耀庭换帖为兄弟）之子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径去天顺祥拜会李耀庭，让李身价日重，人称在野“相父”。因此，天顺祥得到各地官府的支持，营业蒸蒸日上。在办理公私汇兑业务方面尤为兴盛，藩库、盐粮各署、书院等的公款，商行店铺的营运资金，都存入天顺祥。凡协饷、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每年滇省官兵的俸饷银60多万两，也由天顺祥领汇。上京赴考的、进京公干的，所带盘缠，都由天顺祥汇去。富家捐官，卸任官吏解银回家，天顺祥也为之承办。特别是中法凉山之役，筹垫饷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又收存出逃王公银款，贱买逃难者的财物等业务，天顺祥钱庄均获利甚巨，吞没其无人收领的款项，亦所常有。慈禧太后出逃西安，天顺祥以大笔银两相助而增加了政治资本。此时，天顺祥的业务几乎遍及全国，在香港、越南海防也设立了分支机构，成为南帮票号的佼佼者，堪与三晋票号相匹敌。

至光绪末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变化，钱庄、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相继出现，票号式微。1903年，王兴斋去世，王、李二家渐生裂痕，致使天顺祥格局变化，业务大不如昔，各处多有亏空，元气大伤。1911年，王、李二家派人到各分号结账，结一处收一处，煊赫一时的天顺祥钱庄到此基本结束。昆明、北京、汉口等地天顺祥钱庄是分家后由弥勒人张敬臣的孙子张爱堂经营管理。

郑开文年轻时曾一度经商糊口，在通海、竹园、玉溪、弥勒、开远、蒙自、普洱、磨黑一带贩卖通海酱油、竹园红糖、普洱茶叶、磨黑锅盐、玉溪烟丝、蒙自舶来百货等农副产品、杂货。

略有积累后，与他人合资成立通海“德鑫”商号，与弥勒天顺祥钱庄有业务上的联系。天顺祥创办者王炽，广西州（今泸西县及弥勒县境内）十八寨（今弥勒县虹溪镇）人，其先祖原居应天府（今南京）柳树湾石门坎（今南京中华门外），笔者数次前往调查，其柳树湾石门坎系明朝初期屯兵之军营，傅友德、沐英的征滇军队即由此地出发，正是郑开文祖籍之地。王炽与郑开文可谓是五百年前的一家人，故对郑开文有格外的关照。1906年5月，郑开文在日本留学时，曾多次函电邀约天顺祥钱庄捐款注资《云南》杂志社，天顺祥遂成为《云南》杂志名誉赞成员之一。^[20]1909年5月，郑开文毕业归国在北京等候清政府考试期间，与陈爱堂等云南故旧有了更多的交往，募集了部分资金寄往东京《云南》杂志社，帮助杂志社摆脱经济困难，继续出版发行了《云南》杂志19-23期，陈爱堂功莫大焉也。

郑开文为云南杂志筹集款项时，着力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思想，促其同情革命，遂转而成为支持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云南文史资料选辑》载有护国战争期间的一段往事，与陈爱堂有关。作者陈天贵曾于1912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中任右纵队机关枪队长，时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的副官。他回忆道：

蔡到泸州时，派刘云峰为赴京代表，任务是和段祺瑞商议关于四川今后军事部署，命我随同前去，又召我面见。蔡的喉疾，已不能发言，笔谈说：从云南运来的鸦片八万两，现在大舟驿，由你运去汉口出售，关系全军吃饭，你要负责。我答谨遵面命，负责到底，完成使命。蔡点头，并派一个连护送。……到汉口，我与刘住日租界汉口大旅社，滇军一连，由天顺祥滇人陈爱堂招呼住英租界，鸦片八万余两，全数由陈爱堂经手出售，得二十几万元，全部汇至交罗佩金。^[21]

此事说明天顺祥掌柜张爱堂等民族资本家出于正义，曾积极参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和护国战争，对革命党人有实力资助，其功绩不可泯灭。亦可见郑开文回国后积极宣传民族民主革命，联络各方面同情革命人士，积累人脉资源，为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

蔡锷调职北京后，北京天顺祥钱庄遂成为蔡锷在北京的秘密电台所在。北京天顺祥钱庄旧址位于北京崇文区东打磨厂街，蔡锷秘密联络南方各地的电文均由棉花胡同的蔡宅专门人员送至崇文区东打磨厂街天顺祥钱庄的内部电台拍发，措施非常严谨。可以看出，蔡锷对袁世凯始终怀有戒备心理，不会轻易相信袁的花言巧语，并在策略、组织上作了很好的应对措施。

袁世凯准备复辟旧制的那段时间，对蔡锷等中央官员的监视加剧，察觉到蔡锷频密与南方各省电讯往来，于是派特务、警察搜查了蔡锷在棉花胡同的住宅，希冀查到秘密电台。1915年10月14日上午，京畿军政执法处排长吴宝望带兵闯入蔡锷住宅。据上海《时报》报道：“有着军服者五人贸然来，声称系军政执法处卫队，奉处长谕：‘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蔡宅家丁方欲拦阻，已排闥而入，翻箱倒箧，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事后的一些资料显示，是这段时间蔡锷频密地向西南、广东方面发送电报，而这些电报均没有通过统率办事处电报室，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以为蔡锷在寓所设有秘密电台，遂行抄家以寻找证据。以蔡锷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当然不可能把电台架设在家中，让人抓个现行。事后，蔡锷故意严词质问，借故发泄对袁世凯的不满，袁世凯为掩人耳目从监狱中提出罪犯数名，予以枪决，敷衍了事。其时，蔡锷已知袁世凯的意图，为消除袁世凯的猜忌，蔡锷常与一帮权贵人物、京城阔少，出入北京八大

胡同妓院、戏院，装出风流倜傥、胸无大志的样子。在那里，认识了名妓筱凤仙，只是后来蔡锷讨袁成名后，他与筱凤仙的故事被文人墨客愈传愈奇。诚然，蔡锷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得已采取一些曲意周旋、甚至颓废的生活方式，以蒙蔽袁世凯，已被众多历史材料所证实。但现时一些影视文学作品，刻意片面取用蔡与筱凤仙的桃色新闻来博取读者观众的眼球，既不尊重史实，也贬损了蔡锷将军的英名，让知情者十分愤怒。

作为梁启超的弟子，蔡锷深受立宪派思想和行事方式的影响，习惯于走上层路线，利用现有政治结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理解，在动荡年代，拥有军队资源和人脉资源多寡以及质量的高低，是各政治利益集团存在的价值所在。实力才是政治的不二法门，方可由隐而显，左右政局的走向。所以，蔡锷在北京的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其思想坚定，组织严密，斗争策略灵活，手法娴熟，坚忍沉毅，非常人所及，具备高度成熟的政治、军事素养，为当时代中国军政界不可多得的佼佼者。

蔡锷曾在广西编练新军、担任过云南都督、北洋政府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在中央政府和南方各省广有人脉，追随者甚多，在护国战争的发动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是梁启超统一进步党的主要成员和领袖，与革命派领袖黄兴保持着特殊关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陆荣廷、陈炳焜、龙济光、龙觐光、刘显世、郑开文、刘存厚等人有着密切联系。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江苏、陕西等地，在护国战争前已联结成某种程度的联盟关系，暗通信息，相互联络。这就是蔡锷 1915 年 12 月 19 日到达昆明时，南方各地政治、军事的格局。由此论及，蔡锷在护国战争中，起着革命派、立宪派、西南地方实力派相互联系的纽带作用，成为各政治派别联合反袁的标志性人物。某种程度上，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偏隅云南边疆的唐继尧，也是个客观事实。

1914 年 4 月，由云南都督唐继尧、北京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蔡锷将军共同谋划、运作，郑开文调往广东，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第一混成旅代理旅长，其后任旅长。袁世凯在北京成立陆军部模范团时，龙济光亦步亦趋地在广东成立陆军模范团，实际上是龙济光的警卫团，兼以轮训基层官佐的教导大队罢了。他自任团长，却很少理事，模范团的所有日常事务均由副团长郑开文办理。郑开文办事严谨，富于实干精神，对编练新式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能够不惜余力。且为人忠厚本分，淡泊名利，深得龙氏信任，为“龙氏集团新军事思想的智囊人物”。^[22]广东第一混成旅有 2100 余人，模范团有 600 余人，主要驻扎地为广州城内观音山（今越秀山公园）都督府周围，成为龙济光军队中最重要的力量，并占据最显要的位置，若一旦发动，足以掐龙济光之七寸，致以生死之命脉。郑开文利用其合法身份和在军、政界的人脉资源，聚结了部分云南籍革命党人和广西南宁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如引进炮兵副团长江映枢，参谋孙明等人，掌控了龙济光部分军队的控制权。郑、江、孙等人利用其工作方便，谋建势力，考察、培养骨干人员，适时输送到粤军基层部队，取得显著效果，遂成为 1916 年前后广东政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例如，1916 年 4 月，北洋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咨议官李鸿祥来粤，通过郑开文运作，顺利得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旅）军长，直接参与广东护国战争，即是佐证。

蔡锷在北洋政府海陆军统率办事处和经界局任职时，与广东其他盟友的联系，也有通过郑开文与之联络的痕迹。如蔡锷 1915 年 9 月 27 日致广州谭典虞电：“广州郑旅长译转谭典虞鉴：炳密。

本局拟续行呈请裁并，台端可暂缓北来。沁。”^[23]广州郑旅长为郑开文，谭典虞，^[24]即为谭学夔（字典虞），与蔡锷同属立宪派，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长，因遭人嫉恨被迫返回广东，时任广东将军府顾问（其兄谭学衡亦为广东政坛名流）。此电文和1915年8月20日蔡锷致郑开文电文表明，郑开文以广东第一混成旅旅长的身份潜伏在广东，负有促进龙济光军事集团向进步势力转化的艰巨任务，而郑开文所在场所实际上成为了蔡锷、唐继尧、黄兴等革命党人和地方实力派的联络站，是反袁各派力量在广东的一个秘密基地，成为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等党人进入国内筹划起义的重要通道和立足点，也有可能是革命党人武器装备、战争资源（包括资金）的中转站。蔡锷、唐继尧函电中屡次提到“广东早已运动成熟”“粤东将士，现已组织护国军，刻期举事”，绝非蔡、唐的虚张声势，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发动，却需要郑开文等人的周详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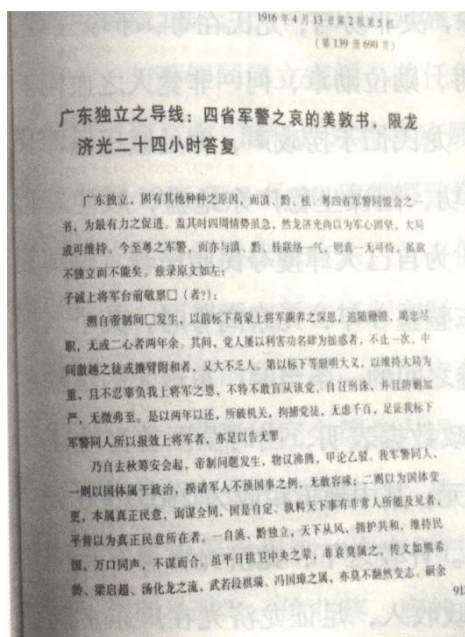
第六节 四省军警同盟会之“哀的美敦书”

广东临近香港、澳门，一直是革命党人的根据地，也是袁世凯、革命党人、立宪派等各派政治力量激烈争夺的地区。特别是云南护国首义后，面对强大的袁世凯政权，发动护国战争的将领意识到，护国战争将是长期的、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出于对护国战争的联盟关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因而对广东的争取和谋划，最为着力。但是，民国人都知道：惟广东完全势力，尚属龙氏掌中，蒂固根深，决非易与，龙氏在粤，于今三载，与党人深种仇恨，且其部下之中将少将，勋位勋章，何一非党人之血肉。冰炭水火，岂可相容？作为广东都督，龙氏忙于捞政声，四处镇压军民党非常的卖力，着意向袁世凯争宠邀功，图谋坐稳广东地盘，顺便着以大办实业、巧立名目繁多的各种税收，为自己大肆攫夺民脂民膏。据《民国广东大事记》统计，龙济光统治广东整整3年，无奈离粤时，其个人财产竟有数千万元之多，还有往来于粤港之间的一条当时广东最大的运输船为其老婆所控制，获利颇丰。各省财政数据表明，当时全国首富地区为广东省，1916年财政收入为38187000元，其中地方税收为25057000元。云南省1916年财政收入仅为572万元。计较之下，龙济光在粤三年间贪腐的钱财竟然等同于云南省两年的财政收入，足证龙济光在广东贪腐之巨，敛财速度之快、手法之高超，令人瞠目，又可见他平时的心思都用在了何处，整天忙碌都干了些什么。

1915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洪宪改政，龙济光、龙觐光分别被册封为郡王、公爵，宠信有加，身价百倍。为了报效袁世凯，龙济光授意师爷写了多篇酸叽叽的四六骈文，极尽歌功颂德、谄媚奉承之能事。对袁世凯称帝表达恭贺拥戴，并令全体高级军官具名盖印。护国战争之初，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派出其兄龙觐光（袁世凯任命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第一师借道广西，赴云南镇压护国起义，在桂滇边界与护国军发生激战，表现出极其顽固的反革命立场。但是，在郑开文等革命党人的影响下，龙济光也与党人周旋，有着输诚的盘算，随时准备着看情势的发展，见风使舵。别看龙济光文化不高，但在利害关系的计较上，同时代竟无出其右者。

云南护国首义后，原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立宪派、政学会骨干人物纷纷潜回广州，与郑开文等人联络，运动军队、警察来响应云南护国起义。在粤滇籍高级军官中，第一旅旅长段尔源、第三旅旅长马存发、第四旅旅长李文运等都是济军老将，虽有奉命维持广东各地的秩序而屡有镇压民党的劣迹，但对于民国共和政体未能忘怀，且受郑开文进步思想的影响，对粤省倒向袁

世凯早已不满，都在等待时机。



《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之哀的美敦书》(《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下影印件)

这时广东潮、梅、惠州、高州、肇庆相继独立，桂军、民军陈兵三水、虎门，只拥有广东半壁江山的龙济光犹如困兽。龙济光对军中动静也有所察觉，为防止兵变并保住自己地位，一方面将屯驻城内的军队调出城外，将部分大炮枪械的部件收缴，新式武器装备拉上观音山，加固观音山要隘、修建炮台，备作困兽之斗。一方面急电袁世凯报告粤事吃紧，要求派北洋军、军舰入境粤中，以资镇守。龙济光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大有牺牲粤省安宁，以换取自己地位之意，激怒了在粤的革命党人。1916年4月5日，为了阻止北洋军入粤，促使广东独立，郑开文、李鸿祥、江映枢、孙明、赵伸（云南派出的代表）等人密议举行兵谏，逼迫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从郑开文一贯稳健的行事风格来看，广东和平独立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有利于护国战争的进行。参会人员最终决定以滇桂黔粤4省军警同盟会的名义向龙济光发出最后通牒，限龙济光24小时内宣布独立，否则“惟有自由行动”。

当时《申报》记者的报道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了解促使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并参加西南护国阵线的过程。《申报》1916年4月13日发布消息称：五日，某军长晤龙济光谈次，亦极力主持谓粤省非独立不足以维持中国之大局，而绅商各界亦同时请愿。故遂决于六日宣布独立。^[25]

“某军长”是谁？为什么其“亦极力主持谓粤省非独立不足以维持中国之大局”一席话，就能促使龙济光回心转意，“遂决于六日宣布独立”，让酝酿数月的广东独立成为现实。以其时广东政局的现状分析，广州没有军级单位编制存在，外来官员也无军级大员到访，此时能够与龙济光酌商军政大事的粤军“军长”仅有郑开文一人。凭据有二：其一，时在广州观音山都督府的军政人物，除龙济光外，郑的职务最高，其部扼守广州市内，作用最为重要。该记者发稿时，郑开文已是广东军政厅厅长，尔后为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军长、护国军军务院第七军军长，自然以某军长称之为宜。其他旅团长则不能称为军长，4月24日，段尔源、李鸿祥、马存发、郑开文、李文运被任命为广东护国军第一至五军军长，其实是虚张声势的，实际兵力均是一旅编制。其二，龙济光早就

知道郑开文同盟会骨干的身份，其与此次反袁护国的风云人物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都有非比寻常的关系，郑开文此时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就是唐、蔡、李的意见，大势所趋，龙济光不得不通过郑开文向护国讨袁阵线输诚。

后续的材料证明，郑开文转递的“请愿书”不是“绅商各界亦同时请愿”的信函，而是轰动时局的《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书》，时称“四省军警之哀的美敦书”，即四省军警同盟会最后通牒。“哀的美敦”，乃英文“Ultimatu”的译音。

滇黔桂护国军在贵州、四川、广西的节节胜利，形成全国合力声讨袁世凯的局面，唯独广东态度暧昧，迟迟不见动静，遭到中外舆论讥讽指责，当然不为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认可。清末民初的封疆大吏都清楚自己的本钱就是握有军队，一旦这数万大军都不听话了，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克的，济军内部不稳才是龙济光最为担心的事。“四省军警之哀的美敦书”，彻底捅破了龙济光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压垮龙济光的“最后一根稻草”。《申报》亦称之为：“广东独立之导线：四省军警之哀的美敦书，限龙济光二十四小时答复！广东独立，固有其他种种之原因，而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之一书，为最有力之促进。盖其时四周情势虽急，然龙济光尚以为军心固坚，大局或可维持。今至粤之军警，而亦与滇、黔、桂联络一气，则真一无可恃，虽欲不独立而不能矣。”

1916年4月13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用大幅篇章刊登四省军警之哀的美敦书。兹录原文如左：

子诚上将军台前敬禀口（者？）：

溯自帝制问题发生以前，标下荷蒙上将军圈养之深恩，追随鞭镫，竭忠尽职，无或二心者两年余。其间，党人屡以利害功名肆为摇惑者，不止一次，中间激越之徒或攘臂附和者，又大不乏人。第以标下等颇明大义，以维持大局为重，且不忍辜负我上将军之恩，不特不敢盲从该党，自召刑诛，并且防剿加严，无微弗至。是以两年以还，所破机关，拘捕党徒，无虑千百，足证我标下军警同人所以报效上将军者，亦足以告无罪。

乃自去秋筹安会起，帝制问题发生，物议沸腾，甲论乙驳。我军警同人，一则以国体属于政治，揆诸军人不预国事之例，无敢容喙；二则以为国体变更，本属真正民意，询谋佥同，国是自定。孰料天下事有非常人所能及见者，平昔以为真正民意所在者。一自滇、黔独立，天下从风，拥护共和，维持民国，万口同声，不谋而合。虽平日拱卫中央之辈，非袁莫属之。传文如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之流，武若段祺瑞、冯国璋之属，亦莫不翻然变志。嗣余商工各界，亦若深痛当局之所为，大惧祸至之无日，标下等始恍然知民意本野心家所构造。上念家国有沦胥之忧，近察民心有瓦解之势。设将顺民意，则有附乱之嫌；若力抗潮流，益滋构怨之道，用是日夜思维，进退失据，相顾惶惑，无所适从。

初谓我上将军受粤省三千万人付托之重，自宜（宜）维持粤省之治安，傥能率师进讨，奠定西南，则粤民固可免池鱼之累；若其不能，则当视民意之所指，步武桂省宣布独立，抚辑党人，维持和平。孰料弥月以来，我上将军徘徊观望，态度迟疑，既无以安标下等之心，又无以慰粤民之望，甚或疑及平日亲信之部下，迭试缴炮易枪之所为。用是标下等益复彷徨，栗栗危惧。迫不获已，各举代表前赴某地组织会所，秘密参商。余谓吾人既为粤人负捍卫之责，自当以粤人之好

恶为好恶；粤人所好者和平，故吾人当为粤人谋和平。前此两年间，乱党潜谋暴动，标下等以为欲破坏粤省之和平，故誓不为彼等所煽惑，虽战友手足，或以受其运动为上将军察悉，炮烙析割，备受五刑，亦以顾念和平，无遑怜恤同类。今者黔、桂独立，时局已非。粤省輿情，大异畴昔。粤人目观黔、桂独立，商民安谧，异夫平时不独立，则闻风鹤，市井恐慌。故其希望独立之殷，不啻大旱之望霖雨。

吾人既依民意以为向背，自不能不视人心，以为转移。既视人心为转移，则对于我上将军，又恐不能如前之尽职。是以一再思维，不得不甘犯斧钺，披洒上陈。倘上将军能鉴标下之愚诚，而俯顺军民之公意，则上下收一德一心之效，而大局赖以保全。若谓公意不足轻重，平和不须保持，恃其坚甲利兵、金城汤池以为得计，则须知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始皇有长城之固，犹亡于涉、广之揭竿，上将军纵欲拥兵自卫，其奈人心既去，固不难倒戈相向乎？此标下等所为，上将军至不取者也，伏维上将军通权达变，自昔已然。数十年清室之恩眷可忘，则袁氏僥来之名器，奚不可以敝屣？若虑民党挟宿怨以图报，则李准之先例可援。民党非仇上将军，不外仇视民国之公敌。上将军果能宣布独立，开诚布公，一视同仁，民党将歌功戴德之不暇，又何计睚眦之小怨哉？反是不思，坚持己见，则标下等亦自知不能更护上将军之信任，当思所以自全。维上将军谅其公而忘私之情，勿谓标下等辜恩负德而已。

是否有当？务乞于二十四时间以内决定大计，表示态度。若逾期不报，则此后惟有自由行动。临颖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肃此具稟，敬叩勋安！

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叩

中华民国五年四月^[26]

此《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书》，笔者向认为出自郑开文之手，理由有下列：其一，此文以信件方式送达龙济光之手，时间是1916年4月5日。广东独立前有陆军2师1旅，没有军级单位存在。第一师龙觐光师长，其大部已在一月初开往广西百色。第二师由龙济光本人兼任师长，段尔源、马存发、李嘉品、李文运等“四大天王”均为旅长，此时被派遣在广东各地与民军厮杀。彼时身在广州能够与龙济光交涉并达到预期效果者，仅有广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广东陆军模范团团副郑开文。从此《袁的美敦书》的内容分析，所有叙述的军警事务范围均在广东，并没有涉及滇黔桂等省，此袁的美敦书撰写者“标下等”显指郑开文等人。

其二，文中叙述与龙济光的交往为主线，时间、经历都与郑开文进入龙氏军事集团的时间、过程相关。郑开文于1914年5月到任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发文时届满2年，而龙济光所部军警则是1913年二次革命时进入广东的，时间为3年。

其三，此“袁的美敦书”所揭露的军情实况，显然是十分了解广东军界内部情况的高层人士。郑开文所部扼守广州市内，郑为龙济光军政事务的智囊人物，与龙济光朝夕相处，易与获取情报。如4月2日，龙济光、龙裕光致电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商定援军在粤登陆地点及军队传输之所；4月5日龙济光致电海军总长刘冠雄等绝密军情，非内部核心人员是不可能知晓的。而选择广东独立的时间恰好在“迨四日早接政府电，知北军确不能多拨军队来粤，而桂军又相逼而来”的时间

窗口，也说明应是内部核心人员所为。

其四，此信件的落款是：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如以四省军警同盟会组织名义发出24小时有效的最后通牒，必然有滇、黔、桂与粤之间相互联络、商议的电文，但是在护国战争档案材料及唐继尧、蔡锷、李烈钧、陆荣廷等人的函电中均无此项记载。西南四省“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组织是否早已存在，还是郑开文等人借其名，凭其势，来促使龙济光迅速响应独立所采用的策略？由于缺乏其他资料的佐证，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其五，从《哀的美敦书》的文章风格、遣词用典、语气停顿等行文风格来看，和以往郑开文撰写的电文、文章，诗词楹联一样，其特点相似度很高。

对照云南丽江黑龙潭公园碑刻《哀乌斯藏辞并序》、上海申报《西征滇军联长郑开文电》和下文将提及的云南省府档案《广东第三师师长郑开文致孙中山等广州军政府各总裁电》、上海申报《郑开文致孙中山等广州军政府各总裁电》等，都有以讲求破题、承题、起讲、领题等固定格式的明显痕迹，连贯始终。其行文论理、说事逻辑清晰，引经据典繁密，条分缕析至详，甚至往往给人以“啰嗦”的感觉。当然啦，笔者也观摩过与郑开文同时代的许多军政大员的各类函电，都明显有旧时文章格式的痕迹，只不过郑开文的文笔风格更显突出罢了。

由此判断，郑开文利用其在粤军内部的革命力量，以“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的名义向龙济光发出最后通牒。此“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的实质就是蔡锷“粤省党人运动，亦已成熟”的组织形式，或者是唐继尧提到的“粤东将士，现已组织护国军，刻期举事”的“粤军总司令长官”郑开文促使广东独立的谋略。加之《四省军警之哀的美敦书》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诸多要素汇集一起，确定此文出自郑开文之手，应是恰当归依。读者若细细分析体会上述文章，自然会赞同笔者的意见。

第七节 郑开文与广东独立

1916年4月6日下午，“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动用“宝璧”舰向观音山发炮示警。这时只拥有广东半壁江山的龙济光，既迫于滇桂反袁军和民军的压力，又加之济军内部不稳，北军增援遥遥无期，袁世凯又许其“独立拥护中央”，于是龙济光与张鸣岐、蔡春华、李福林、颜启汉、贺文彪、李文运、胡令宣等歃血为盟，宣誓“不服从命令者，天诛地灭”，誓毕即通电宣布广东独立。

1916年4月6日，龙济光以广东都督的名义，继云南、贵州、广西之后宣布广东独立，布告云：

为布告事：现据广东绅商学各界全体公呈，粤省连年灾患，地方已极凋零，近来各省多已反对袁氏，宣布独立。粤省危机四伏，糜烂堪虞，各界全体为保持全省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集众公议，联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保卫地方，维持秩序。此系拥护共和，天经地义，即请刚断执行。等呈。查阅来呈，持议甚赅。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前提，刻即通电各省、各机关、各团体，及本省各属地方文武，即日宣布独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国旅粤外人，统由本都督率领所属文武担任保护，务须照常安居乐业，毋庸惊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籍端捣乱，扰害安法，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职。其各同心协力，保卫安宁，有厚望焉。特此布。^[27]

此告示只提示独立为维持地方治安，态度极为含混，语气平和，未尝有指斥袁氏之檄文，又未尝有嘉许护国军之语气，更没有提出实际的措施和行动与西南各省相呼应，如出兵讨袁、释放从前所捕获的党人、诛戮民党所切齿痛恨的蔡乃煌。龙氏之独立，明眼人一看就知实出于势穷力尽，敷衍各派力量的无奈举动而已。时有著名独立新闻人邵飘萍发表《日人之观察广东独立》文章评论说：

广东独立而后，日本报纸载某消息家之谈曰，广东既于本月六日宣告独立，该省将军龙济光，昔并非与革命党同臭其味，然亦无不可不始终忠于北京政府之因缘。惟计广东省之平和，与一身之安全，乃出此耳。一方彼与广西陆荣廷有姻戚之关系。广西独立以来，两方屡屡交涉，或因陆氏之斡旋缓和彼与革党之关系。加以南韶连、钦廉两镇守使之独立，潮州、汕头各处之独立，龙济光即不欲宣示其态度，亦为四围情势所不许，惟向之踌躇不决者。

龙济光自作聪明还不止于此，在敷衍对付军队将领的同时，自己又起草了一封电报，密奏袁世凯，陈述他不得不独立的苦衷，大倒苦水云：“政府援军、军舰未到，民军攻城日迫，粤军内部不稳等原因”，又“军官绅士以秩序关系，强迫济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往复数四”，最后“即请以广东都督，藉以维持地方秩序”。表明广东的独立是出于情势所迫不得已而出此“缓兵之计”，既非真心，亦非己意，以求得袁的谅解。詎知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哪里是区区龙济光哄骗得了的？得龙电后，即洞察其意，马上让政事堂拟了一道电文，居然是非驴非马的“独立拥护中央”，还是将广东捆绑在袁世凯政府的战车上，以鼓励其他各省群起效仿这样的假独立、伪独立。

随后，舆论为之大哗，各方纷纷来电责问：广东既已宣布独立，而一省军政长官却仍然听命于袁世凯指挥，岂非滑稽可笑。仅隔一日，孙中山、蔡锷、陈炯明等通电全国，指责龙济光贪恋权位的假独立，号召各派力量推翻龙济光，以岑春煊暂代广东都督。各派力量的意见、评判也纷纷见诸报章，如国民党之布告、胡鼎男之宣布、朱执信、邓铿等公启，皆洋洋洒洒，词义严正，其所主张，大抵皆以龙氏去位为前提。

其中蔡锷斥责龙济光的“伪独立”确另有其故。蔡锷在京时曾频频与龙济光昆仲联络，约为共同起事，并与江苏冯国璋、贵阳刘显世、云南唐继尧等合为一体，纳入己方阵营。然而龙济光两面押注，见风使舵，一直在各派政治力量间玩平衡，致使广东独立响应一直延宕，破坏了蔡、梁在天津拟定的南方各省独立后，滇、黔合谋四川，桂谋湖南，粤谋江西、福建的军事计划。拖延的结果让战局演变的扑朔迷离，直让蔡锷在四川战场吃紧多多，曾一度濒临绝境；其结果还是让桂系陆荣廷、国民党李烈钧捷足先登，占据了广东这块财赋之地，岂止是闹心，简直就是背后插刀子。

虽然言说、议论不足为凭信，但是留下些不同版本的悬念，给了笔者继续追踪的线索。果不其然，上海《申报》的即时报道让我们多少有点回归历史现场的感觉，《广东独立纪详》云：

桂省独立后，粤民心理久已赞同，故绅商各界，迭有宣布独立之请求。龙、张两大吏，为顺从民意，保护地方起见，特于六号下午三时，在观音山大开会议，召集文武大员、绅士商董，讨论独立事宜。列席者蔡乃皇、凌福彭、李翰芬、邓瑶光、胡令宣、王广龄、蔡春恒、郑荣、李国治、蒋继伊、龙裕光、黎廷桂、黎熹潘、元耀、丁乃澄、岑伯着、叶舜琴及师旅团长统领等九十

三人，先由龙、张宣布各界请愿书，互纾意见。直至六时许，讨论告终。各员推举龙氏允就都督任职，即行宣布独立，分电各省赞同，飞飭文武各机关悬升白旗，并电海防办事所、水上警察厅，将大小兵舰一律调回省河，另派“江巩”兵舰开往三水河口扼守，其余各舰，沿江寄碇，听候调遣。^[28]

这个报道把袁世凯的心腹蔡乃皇、凌福彭、李翰芬等人列于其中，多少有些牵强，有捕风捉影之嫌。4月6日前，张鸣岐称病，凌福彭、李翰芬等人开溜香港，铁杆保皇分子蔡乃皇不见踪影，说明商议广东独立的人员组成并非记者所报道的现况。以郑开文为首的广东第一混成旅、广东陆军模范团是策划、支持此次广东独立的中坚力量，其作用不可能混同于一般文武大员、士绅商董，将郑开文的名字囊括在“师旅团长统领等九十三人”中，让人觉得很意外。这表明龙济光于独立后，仍思掌握粤省军政实权，与革命党人的主张不愿一致，还试图雪藏郑开文等人倡导独立的功绩，大耍首鼠两端、脚踏两条船的权谋诡计，让知情者愤怒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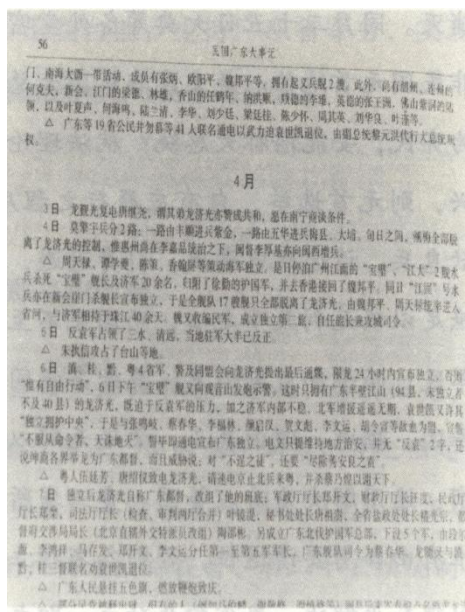
开弓没有回头箭，面临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显然不会幼稚到仅仅发送了最后通牒就停止了广东独立的步伐，郑开文谨慎稳重的性格和做事滴水不漏的秉性，确保了广东独立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4月6日夜，第一混成旅、陆军模范团在各个军事要隘、制高点布防，观音山上戒备森严。龙的私人卫队受到警告，被要求保持中立，按兵不动，都督府彻夜灯火，人影憧憧。那天夜里，观音山都督府内似乎没有发生“烛影斧声”式的谋变，但是陈兵观音山都督府“兵谏”阵仗下的“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的循循开导，是否发生过，则不得而知。这不，欢庆广东独立的欢呼声、燃放鞭竹的烟雾还未散去，4月7日，广东独立后的第二天一早，龙济光匆忙发布了广东都督府的组阁名单：

龙济光自称广东都督，改组了他的班底；军政厅厅长郑开文，财政厅厅长汪度，民政厅厅长郑燊，司法厅厅长（检查、审判两厅合并）叶镜湜，秘书处处长唐祖澍，全省盐政处处长褚光宗，都督府交涉局局长（北京直辖外交特派员改组）陶邵彬。另成立广东北伐护国军总部，下设5个军，由段尔源、李鸿祥、马存发、郑开文、李文运分任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广东舰队司令为蔡春华。龙随又与滇、黔、桂三督联名劝袁世凯退位。^[29]

从这份广东都督府组阁名单来看，最为明显的是张鸣岐、凌福彭、李翰芬等原军政大员的缺席，昨天还未列入广东独立名单的郑开文，一夜之间，从幕后直接冲上了前台，成为广东都督府军政厅厅长，而不是龙济光嫡系的段尔源、李嘉品、马存发、龙裕光、李文运等“功勋卓著”的中将、少将们执掌军政大权，出乎常人预料。军政厅长是一省军队的实际运作者，在政局动乱之际，谁掌控了军队，实际上就掌握了一省的军政大权。军政厅厅长郑开文的革命党人身份，使新成立的广东都督府，具备了革命党人执政的意味。

龙济光迫于“滇黔桂粤军警同盟会”陈兵观音山都督府，予以“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的循循开导，不得已将郑开文推向前台，颇有些“政由宁氏，祭由寡人”的密约踪迹。在此形势下，龙济光虽心有不甘，但面对各方伪独立的责难和应对扑朔迷离的局势则显力不从心，一切交给郑开文打理，只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和财产，就阿弥陀佛了。龙济光做了个挂名都督，倒也自足，变着花样到处发表龙都督的布告，要“与民更始”削减小额税收，以拉拢绅民商户，到处转悠着谈

话、演讲，刷存在感提高知名度。但是终因功利、企图心太过明显，仍得不到革命党人的支持，陷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尴尬局面。



广东独立时郑开文任广东军政厅厅长的史料记载（《民国广东大事记》，广东省图书馆提供）

按照与唐继尧、蔡锷的约定，郑开文借用龙济光、张鸣岐（其时已开溜香港）的名义，重新发布广东独立通电：

龙济光等宣布粤省独立电（1916年4月7日）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均鉴：顷接广西陆都督电称：接唐、刘两都督会电：南宁陆都督鉴：粤养陆电悉。西南举义，非争意气，非贪权位，惟欲拥护国法，巩固国基。袁氏前令撤销帝制，其果出诚心与否，且拂（勿）深究，但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大总统资格早已消灭。同月二十五日大典筹备处堂密电云：今上所居，乃帝国元首地位，非民国元首地位。是袁氏非民国大总统，在彼亦已自承，今称帝不遂，分为齐民，安能僭称大总统？就法理论之，我民国已为袁氏所篡灭，灭而复兴，则元首选举，自有应履行之程序，今袁有何理由擅自盗据？粤省若欲息兵，请速联电袁氏，引身逊避，服法律之制裁，静候新选举之结果，庶足以确无利天下之心，而国宪不至破坏，然后继尧、显世有辞谢滇、黔军民，而平和可期恢复。尊处若意同，请挈銜复粤。继尧、显世叩。江。等因。据电，理由甚正，荣廷无辞以难，而公既力任调人，请即将此电转京，速用解决为盼。等因。查三省所据理由，甚为正当，欲求保民息战，惟有由各省要请退位，否则各省独立，使彼知人心全去，不敢相持，自可以得和平解决。粤省宣告独立，即本此义。诸公保民爱国，具有同情，惟祝早日一致进行，以免大局糜烂，至为盼幸。龙济光、张鸣岐。虞。印^[30]

重新发布《广东独立电》的落款时间是“虞”，即1916年4月7日。如果说，4月6日龙济光宣布独立的告示，无一字涉及讨袁、与袁世凯断绝关系，连独立后“成立都督府”的必要程序都不敢说出，宣称的还是“维持秩序、保境安民”的套路，通篇都没有反袁护国的字语，甚至还有挑衅、威胁民军的意味。那么，由郑开文主导的4月7日《广东独立电》则大有改观：其一，明

确宣布粤省独立的理由：“……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大总统资格早已消灭，安能僭称大总统？……粤省若欲息兵，请速联电袁氏，引身逊避，服法律之制裁，静候新选举之结果。”其二，附从滇黔桂“去袁、袁必须退位”的主张。可见，时隔一日，广东政局的面貌可谓截然不同，郑开文从幕后走到台前，主持广东省军务，实现了整合广东军事力量、经济资源为护国战争大局服务的初衷。

【相关链接】

广东独立的意义和困局

龙济光与其兄觐光共握广东省之兵权，其部下之二万人，皆其旧党，且多为云南籍者。龙亦云南人，家族居于云南，似为质于南军。彼之崛起，不仅由于革党之逼迫，殆亦因部下之要求，不难想象而知也。龙氏曾在岑春煊之部下，先任广西省左江道，以至广西省陆路提督、第二十五镇统制、广东警卫军副司令等，第二次革命之时，为广东都督，其后遂改广东将军，以至于今日。其状貌魁梧，有豪放磊落之概，然却为精通利害关系之一人。

广东省之面积，十万方英里，人口三千一百八十六万五千，计一方英里有三百十八人，西南诸省中，人口最稠密者也。贵州、广西、云南之三省，地味既瘠，人口又稀，合三省之面积，为二十五万方英里，而合计人口则仅二千五百余万，以三省比之广东一省，竟少一千余万。故广东之独立，加南军以莫大势力，自不待言。且自地理上言，可以利用广东之海岸线轮入军需，于作战计画划，受非常之利益。更自外交上言，广东一独立，则可以置设临时政府，对于列邦，求其承认，其余影响所及，湖南首当其潮流，湖北、江西、福建以及四川，皆将呈一大变态。固与北京政府之前途，有莫大关系云云。^[31]

第八节 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北伐的通电

广东独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北伐，由粤北韶关出兵江西赣州，由粤东泉州攻击福建福州的袁世凯势力，以达成护国军在上海、南京集结的战略目标。郑开文走马上任后，即筹划广东北伐的军事行动，成立广东北伐护国军总部，下设5个军，由段尔源、李鸿祥、马存发、郑开文（兼）、李文运分任第一至第五军军长，设广东舰队司令为蔡春华。原云南政务厅长、第二师长李鸿祥出现在广东护国军第二军军长名单上，出人意料，李鸿祥对此也一直都讳莫如深。在李鸿祥回忆录中，也仅仅略语，说到护国战争中任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军长，“蔡走后，周惺甫伪称赴日本留学，离京避赴东北，我也赴粤任广东讨袁第一军军长”。^[32]护国战争这么大的事情，各方面记载都很清晰。据云南《义声报》1916年5月报道：李鸿祥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军长，并于4月24日发布《广东护国军第二军北伐通电》，署名李鸿祥。可李鸿祥为什么偏说自己是“赴粤任广东讨袁第一军军长”呢，老猿未死前，难道是袁世凯任命的？我想，李鸿祥可能是援引蔡锷入滇领受滇军最精锐部队成立云南护国军第一军进川作战，建立了不世功勋之故，以说明自己地位的崇高。蔡锷提拔唐继尧有识人之明的功劳，至少唐继尧心里明白，没有蔡锷就没有他唐继尧今天之权势，故全力支持蔡锷多少带有是知恩图报的意思。李鸿祥在广东既没有以往的群众基础和军政资源，也没有如李烈钧到云南时握有40万华侨捐款，仅凭嘴一张，就能说动云南老乡龙济光给他一支军队

去讨袁吗？若不是广东军政厅厅长郑开文的鼎力相助，结果会怎样？

关于广东护国军北伐的军事部署，上海《申报》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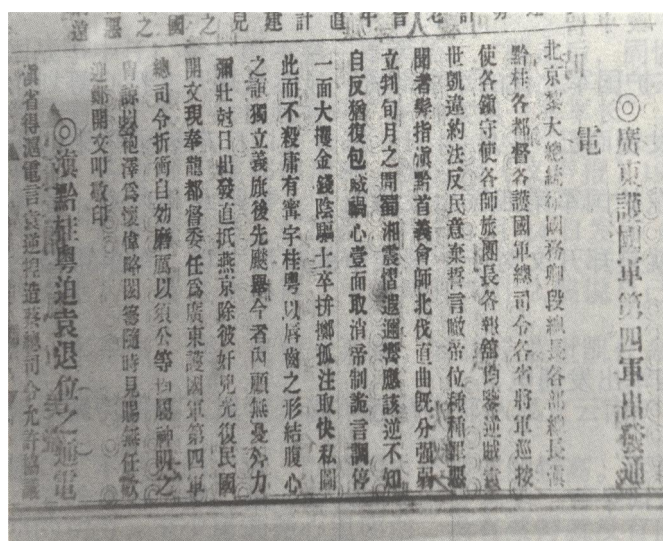
综湘、赣、闽三方面情势，粤省进行以攻赣为最急。闻龙督统领全局，已决定派第一军司令段尔源会同李烈钧，由粤汉铁路出发，驻军南雄，进窥赣省南安府；派第五军司令李文运由东江出发，经河源、龙川，驻军和平，走赣省长宁府（近闻有改派李嘉品之说）；派第二军司令李鸿祥驰往嘉应州，驻军镇平、平远一带，以堵截闽省援军，俾成犄角之势；其余除第三、第四两军，则派为游击之师。各路策应规划既定，近日已经出发者为第一师，其余亦逐渐成行。此则龙督所统辖之一方面者也。

《申报》关于广东护国军北伐的军事部署，显然是郑开文精心筹划布置，以龙都督的名义发表而已。4月24日，郑开文以广东护国军第四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誓师北伐燕京，直捣袁世凯老巢，实质上就是郑开文对于护国战争的政治立场、军事策略的公开宣言。

《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

北京黎大总统、徐国务卿、段总长、各部总长、滇、黔、桂各都督，各护国军总司令、各省将军、巡按使，各镇守使、各师旅团长、各报馆均鉴：

逆贼袁世凯违约法，反民意，弃誓言，瞰帝位，种种罪恶，闻者发指。滇黔首义，会师北伐。直曲既分，强弱立判，旬月之间，蜀湘震慑，遐迩响应。该逆不知自反（返），犹复包藏祸心。一面取消帝制，谎言调停，一面大攫金钱，阴骗士卒，拼掷孤注，取快私图，此而不杀庸有宁宇。桂粤以唇齿之形，结腹心之谊，独立义旗，后先颺举。今者，内顾无尤（忧），齐力弥壮，克日出发，直抵燕京，除彼奸凶，光复民国。开文现奉龙都督委任为广东护国军第四军总司令，折冲自效，磨厉（砺）以须。公等均属神明之胄，谅以袍泽为怀，伟略因筹随时见赐，无任欢迎。郑开文叩敬印。^[33]



郑开文署名《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这份郑开文个人署名的电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逆贼袁世凯违约法，反民意，弃誓言，

瞰帝位，种种罪恶，闻者发指。”师出正义地杀袁护国：“该逆不知自反（返），犹复包藏祸心。一面取消帝制，诡言调停，一面大攫金钱，阴骗士卒，拼掷孤注，取快私图，此而不杀庸有宁宇。”目标明确地护国：“克日出发，直抵燕京，除彼奸凶，光复民国。”

电文开头的称谓“北京黎大总统”是有讲究的，在护国战争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时，提出袁世凯必须下台，听候全国人民的审判，并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依据由副总统接替总统，是具有前瞻性的提法。表明尽管郑开文身在敌营，但是他利用无线电台与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对护国战争的总体方针政策、策略步骤是清晰的。

郑开文发布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北伐出发的通电，对于正在苦苦鏖战的各路护国军无疑具有鼓舞和声援的效果，壮大了护国反袁的力量。

4月8日，陆荣廷、梁启超应龙济光及讨袁民军各方之请，由南宁启程赴粤，帮助广东内部的调停和统一。但是，他们行抵梧州时，发生了4月12日闻名中外的广州“海珠惨案”：在徐勤召集的海珠联席会议上，竟遭到龙济光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等人的袭击，以陆荣廷、梁启超代表身份先期抵粤的汤觉顿、徐勤部中路司令吕仲铭、广东将军府顾问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等四人皆中弹身亡。“海珠惨案”发生在龙济光统治的广州城，龙济光当然就脱不了干系。龙济光的所为引起了广东各派尤其是民军的极大愤慨，陆荣廷也急令莫荣新率桂军入粤，广州城顷刻乌云密布，风雨欲来。但是，陆荣廷与龙济光是旧日同僚，又是儿女姻亲，并不想双方交战两败俱伤。事实上，陆荣廷、梁启超到达肇庆后就驻足不前，莫荣新部也在三水停下。4月19日，岑春煊偕温宗尧、章士钊、李根源、周善培、杨永泰等由沪、港同至肇庆，经商议后，决定采取逼龙济光让粤督位给岑春煊和龙济光率军北伐的措施。龙济光在军队的驻防上稍作让步，但始终不肯让出粤督的地位。为了达成有利条件，龙济光以犒军名义派遣郑开文至肇庆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总部洽谈相关问题，《申报》报道：龙都督派员赴肇犒军函云：

窃济光仰承明教，共许驰驱，遥企鸿晖，莫名下悃。兹汪滇、桂联军兴讨，义帜遍征，济光志切同仇。忝属地主，壶浆膏秣，诸愧未周。兹特派郑司令开文、普分统怀安、杨知事纶堂暨周子佑、江映枢、孙明等，敬将不腆之仪，聊书犒师之礼。复冀饬知滇、桂义军，希为惠纳。遥想义帜高擎，山河壮气，仰仗指挥若定，捷报前军。筹画宏深，奠安民国。临书神往，无任轩鉴。^[34]

第九节 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与护国军军务院的成立

4月27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达成广西、广东军事力量的集结，是护国运动中一个标志性成果。上海《申报》的现场报道：

……兹闻陆、龙两督又率其所属将士段尔源、郑开文、李嘉品、王纯良、黄志桓、杨晋、纳洪顺、李文运、马如珍、伍敦仁、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等于二十九日致电岑西林氏，略云：两粤独立，全军同仇，固出于报国素具之诚，亦以完我公未竟之志。计自滇、黔首义以来，以贫瘠之区，犹能转战千里，匡复百城。我两粤形势，本为重于国中，我军民事功，岂可反落人后？独念克敌致果，非统一无以图功，而决胜运筹，必元戎乃能启镇。我公为人纾难，百折不回，四海倾心，友邦起敬。况两粤夙为旧部，湛洽恩威，若承出总戎机，必可迅平大难。今谨代表军民奉戴为两广护国联军都司令，今我公备鉴精诚，毅肩难重，则凡我良士，同怀挟积之温，而控此

大邦，伫见止戈之武。谨此电陈，不胜鼓舞，待命之至。[35]

由此看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成立与“郑司令开文”的犒劳滇、桂军活动有关，或者就是郑开文代表广东与滇桂联军洽谈合作事宜而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筹建过程中，郑开文是签署拥戴岑春煊为都司令的13人之一，随即广东护国军并入两广护国军，成为护国军北伐的主要力量。下列岑春煊复陆荣廷、龙济光两都督允就都司令职电文，亦有关郑开文旅长的情况：

急广州龙都督转段旅长、郑旅长、李督办、王镇守使、黄镇守使、杨高雷道尹、纳旅长、李团长、马统领、伍统领。南宁陆都督转陈师长、谭师长、莫镇守使鉴：奉感电，猥以两广都司令见委。频年亡命南洋，实已伤心国事，近感干公招邀，备历人世行路之难，幸得生返里门，本期归守丘墓，谬承大命，曷胜彷徨。受任既非衰朽所堪，临安又无独安之义，强自督责，以死为报。定日就职，别有宣言，意苦语长，另刊邮寄。承念昔日昆弟之欢，又得追随鞭镫之后，既无不可见之诚，安有不可灭之贼。煊虽荫病，犹闻鼓角而自雄，惠揭成俾勿颠越而负命。[36]

此时，龙济光虽然还把持着广东财政权力，但是名义上已在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节制下，这就为中华民国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西南各独立省份的督军、总司令等为抚军。肇庆军务院是当时全国讨袁护国运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它促进了讨袁武装力量的联合，壮大了护国军的声威，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推动了护国战争的顺利发展，加速了袁世凯封建势力的灭亡。

军务院成立前后，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对袁世凯展开政治攻势，曾通由滇、黔、川、湘、浙各独立省，详述两粤军官所誓守之四主义，以表其决绝之态度。其文云（衔略）：

义军之起，职在讨袁。袁苟朝去，兵即夕解。故法之可以去袁者，激急、平和两俱用之。凡义军之不得已与不为己甚之苦衷，当为仁人君子所共谅。乃袁氏阳托自退，阴缓吾兵，诈伪无端，狡猾百出：四川和约反复无成，南京会议咆哮更甚。是故成都发愤而独立，长沙慷慨以兴师，一发危机，幸而得免。若复隳进取之大计，慕调和之美名，则贼智百端，动皆陷阱。若诸公手复之共和，终于袁氏死灰之下。近思死士，远念将来，情何以堪，罪且莫赎。煊等无似忝总师干，众逾十万，城连数百。人皆饮血，士尽枕戈，志本愿为前驱，亦足当后盾。时不可失，兵不可老，贼不可不杀，法不可不护。窃立四义，以之誓师：

一、我军为讨袁而起，袁不退位，绝无调停可言。

二、袁氏退位，我军务院恭承继任之黎大总统正式就职。

三、非至袁氏退位，黎大总统正式就职时，决不停止军事进行。

四、拥护约法，保障国会。俟前参、众两院议员依法集会时，国家大计交其解决。

凡此四者，为我两粤全体军士之所恪遵。计惟本此而行，不敢反颜。凜螯手切腕之训，耻后时留决之讥，斩断葛藤，与贼相搏。凡我同泽，愿鉴斯忱。

岑春煊、陆荣廷、龙济光、陈炳焜、李根源、谭浩明、莫荣新、李耀汉、段尔源、林虎、郑开文、李嘉品、李文运、莫擎宇、隆世储、冯相荣、车架龙、陆裕光、马济、程子楷、李华秋、翟汪、魏邦平、（林）俊廷、沈鸿英、张习、朱福、黄志桓、马如珍、伍敦仁、金镕、邓文辉、申

葆藩、黄克昭、陈坤培等叩。东。印^[37]

肇庆军务院的任务是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实际上是一个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凯交出政权。随后，军务院将南方先后独立省份的军队统编为全国性的护国军，共七个军、一个师、一个旅和一个独立团，准备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开进，大举北伐。军务院直辖滇桂粤护国联合军，其作战计划分四期进行：第一期扫除赣闽边界敌军；第二期进占赣闽；第三期进占湘鄂；第四期直捣幽燕。

军队建制如下（一说为9个军，留守昆明尚有唐继尧军）：

第一军 军长蔡锷，北伐入川。

第二军 军长李烈钧，三师张开儒，四师方声涛。

第三军 军长莫荣新，五旅邓文辉，六旅申葆藩。

第四军 军长李耀汉，三旅李华秋，四旅翟汪。

第五军 军长谭浩明、副军长韦荣昌。

第六军 军长林虎，七旅李思广，八旅陈自先混成旅旅长黄明堂。

第七军 军长郑开文（济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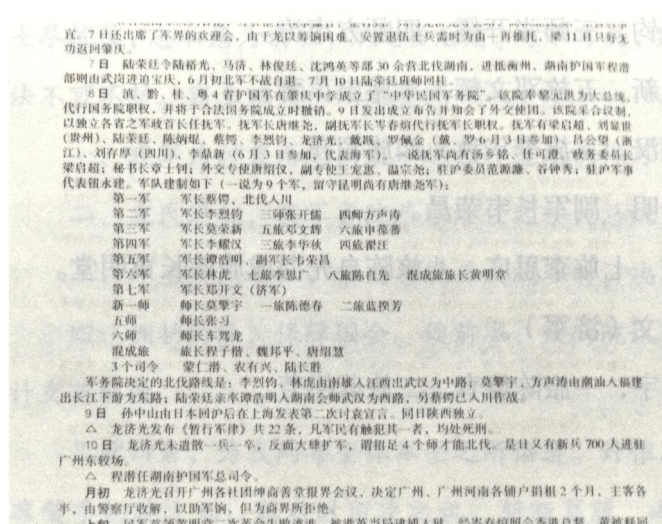
新一师 师长莫擎宇，一旅陈德春，二旅蓝揆芳。

五师 师长张习。

六师 师长车驾龙。

混成旅 旅长程子楷、魏邦平、唐绍慧。

3个司令 蒙仁潜、农有兴、陆长胜。^[38]



郑开文在护国战争期间任民国军务院第七军军长的史料（《民国广东大事记》，广东省图书馆史料）

军务院决定的北伐路线是：李烈钧、林虎由南雄入江西出武汉为中路；莫擎宇、方声涛由潮汕入福建出长江下游为东路；陆荣廷率谭浩明入湖南会师武汉为西路，另蔡锷已入川作战。郑开文为第七军军长，所辖段尔源、李鸿祥、马存发、郑开文（兼）、李文运五个旅（也称为军），以入闽出上海为作战目标。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北伐。陆荣廷率桂军及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部负责主攻湖南，龙济光部配合作战；李烈钧、莫荣新及林虎部主攻江

西；莫擎宇部进攻福建。郑开文参加“征闽之军，以粤军莫擎宇、陈德春、滇军方声涛、林仲墉当之。济军郑开文一军，亦加入此路与浙省军队自南北两端夹攻福建，此为入闽一路。”^[39]

军务院的成立，成为反袁力量集中和团结的一个标志，显示了护国军方面坚持要袁退位的立场和与袁斗争到底的决心。因此，它的成立，壮大了护国军和反袁力量的声势，增强了各派反袁力量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增强了反袁力量的协同性和整体性，使护国力量更加集中，从而催促袁氏营垒内部的分裂和倒戈，加速袁世凯的灭亡。各国对袁世凯的态度，亦因此而为变化，护国军方面在声势上取得交战团体的身份，在国际上孤立袁世凯政权。

军务院成立不久，又有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芑铭相继宣布独立。陈宦、汤芑铭本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他们的倒戈，使袁更加沮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和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唾骂声中病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护国军各党派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与北洋军阀寻求妥协，南北相持局面结束。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于6月7日继任总统。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北京政府于6月中作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的承诺，南北双方达成了停战妥协。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广东军务院。25日，孙中山代表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壮大了反对袁世凯的力量，对分化瓦解敌方阵线，鼓舞讨袁护国将士们的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护国战争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环节。其中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的角力，人性和理智的博弈，众说纷纭。其实，在那个年代，没有自己掌控的军队，没有军事实力的支撑，说客、谋士的纵横捭阖都是清谈，烽火四起的游击战也肯定没有效果。就广东一地的护国战争的前因后果来说，蔡锷、唐继尧未雨绸缪，沉稳布局；郑开文深入虎穴，有效运作，伺机而动，才是这一系列事件幕后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当上内阁总理。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龙济光再次把赌注押在段祺瑞身上。6月9日，龙济光在庆祝段祺瑞“总秉国钧”的会上声言取消广东独立，利令智昏地急忙投靠了所谓的“中央”，彻底暴露了其投机护国战争的私利盘算，破坏了西南连成一片与北方政府争衡的战略部署，与桂军、滇军终成水火不相容的架势。恃有段祺瑞背后的支持，在岑春煊电询龙济光对让出粤督职务和出师北伐的态度时，龙济光强硬答以“民党一日不释兵，则彼一日不离粤”，威逼军务院，责令广东各路讨袁民军听候改编，实质是想趁机取缔民军，公然把矛头指向了军务院和民军，再次激起了中华革命军及广东民军的义愤，纷纷要起兵驱龙，朱执信还提出：“必俟龙济光离粤始允停战。”

在这个时间点上，龙济光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其投靠段祺瑞的举动，完全背离了护国战争中南方各省统一行动的宗旨，受到民军力量、立宪派、护国军内部的质疑和战事纷扰，也引起郑开文的强烈不满。唐继尧、蔡锷、郑开文等人在护国战争前就有把广东纳入己方势力范围的考虑，郑开文就是这个计划的策划人和具体执行人。龙济光是经郑开文与蔡锷、唐继尧等人长时间谋划、运作才加入西南起义阵营的，其中利益的计较、权位的许诺是不可避免的，权谋诡诈的幕后运作，即便在护国战争胜利后也依然不能大白于天下。但是，由于龙济光首鼠两端的观望、迟疑徘徊，坐失了大好时机，现在又迁怒于郑开文没有兑现当时的承诺，迫使郑开文只有选择回避退出。郑

开文知道自己玩不起政治这盘棋，龙济光两次逼迫革命，自己为其策划、推动他向革命力量靠拢，早就有了吃里爬外的嫌疑，其心中必有铲除之意。在群雄逐鹿广东的形势下，李烈钧取代龙济光已成为必然，其主要意图在郑开文率部慰劳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时，李烈钧已经将唐继尧、蔡锷的意见交过底，若郑开文还在广东掌军，自然有许多不便。如果他愿意，依然可以轻而易举地保住自己的地位，甚至可以利用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的力量推倒众人喊打的龙济光，取而代之。但是，争夺杀伐的混乱何能避免？道义情义何在？像当时的谦谦君子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也。郑开文与唐继尧迭电商议的结果，就是利用唐继尧时任军务院抚军长的权力，调动郑开文回滇，为李烈钧让路。

郑开文明白，个人的功业得失都是机缘巧合，正如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争权夺利的悍将多了，事情就会走向反面，自己当年的离开是机缘巧合。而这次选择回避退出，有助于广东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护国战争体面地早日结束，是值得的。1916年6月下旬，郑开文终归选择了平静地离开，没有像龙济光的心腹大将段尔源的通电决裂，也不似李耀汉拉着队伍另立山头，而是自解兵权，没带走一兵一卒。

涉及郑氏家族的一件小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通海县罗庄一滴油郑氏家族墓地立有龙济光撰、唐继尧书的“郑母胡太夫人墓志”石碑。1918年，郑开文欲为祖母修墓，请时任两广巡阅使龙济光撰写碑文，故有“……济光与其孙同寅，颇悉其家世，今春为太夫人树墓石谨志其大要，俾郑氏子孙知先世积累之不易，而福报之非幸邀云尔”之语。同寅即为同朝做官，人各有志，聚离分合自有其然。可见，时隔两年，龙济光对郑开文当时的离开，其心态是平和的，一时的功名得失的计较，无非此一时彼一时的情境而已，当局者不必过于纠结。郑开文离开内战将起、政局纷扰的广东，看起来是个败着，反而机缘巧合地开辟了崭新的人生之路。正合佛语：失便是得，得便是失。事隔三年，等到护法运动大风潮再起的1919年6月，郑开文再次到广东担任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以军事实力推动护法事业的发展，证明他当时选择离开是有先见之明的。

[1] 叶祖荫著《吕志伊与护国起义》，转载自《爱国·团结·胜利——云南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55-162页。

[2] 《唐继尧为早除袁氏请示机宜致孙中山书》，转载自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82页。

[3] 毛注青编着《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459页。转载自《护国军纪事》第1期。函中‘侠公’即李烈钧，字协和，又字侠黄。

[4] 毛注清等编《蔡锷集》《致张孝准书》，1915年11月26日，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第411页。

[5] 《唐继尧复孙中山电》，（1916年5月11日，）转载自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00页。

[6] 《唐继尧等为中日交涉建议西南整理军备互相提挈密电》1915年2月25日（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第205页。

[8] 《护国军纪事》，转载自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第413-41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

[9] 《陈宦为护国军攻占安边场、宜宾危急请速催援军密电》，转载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第529页。

[10] 孙中山著《讨袁宣言》1916年5月9日，转载自《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3-285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389页。

[12] 《致黎元洪国务院电》，转载自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402页。

[13] 李宗黄撰《云南护国纪实》，转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6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

[14] 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19页。

[15] 《黄兴致函张孝准，部署讨袁策略》转自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455页。

[16] 蔡锷致雷飙电，转载于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0页。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4月，第467页。

[18] 江映枢（1885—1953年），字灿北，云南建水人，1909年入南宁陆军讲武堂，1911年随郑开文率部攻打南京。1912年7月，任云南援藏平叛西征军第一纵队联副长。1913年4月随郑开文入新疆平叛。1914年担任广东第一混成旅炮兵团副团长。1919年任驻粤滇军第三师参谋长，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中将参军，1927年任蒙自道尹。著有《江氏兵法》《治安十策》。

[19] 李文汉辑《蔡锷一九一五年在北京与西南各省密电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页。（内部发行，1979年4月）

[20] 《本社名誉赞成员》，《云南》杂志九号、十五号载，转载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第867、871页。

[21] 陈天贵撰《护国战役亲历记》，转载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01-202页。（内部发行，1979年4月）

[22] 日本国北京支那研究会编撰《中国人名资料事典》第2卷，日本国图书株式会社出版1918年，第692

页。

[23] 《蔡锷致广州谭典虞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7页。（内部发行1979年4月）

[24] 谭典虞，即为谭学夔，（?-1916），字典虞，广东新会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创办时任军校炮兵科长，因遭人嫉恨被迫离校返故任广东将军府顾问。1916年4月，代表龙济光与陆荣廷、梁启超代表汤觉顿，康有为进步党方面代表广东讨袁军司令徐勤、福军代表何营长等人，于4月12日在广东海珠水警厅开紧要会议，商议调停军事问题，遂死于闻名中外的广州海珠惨案。

[25] 《申报》1916年4月13日第2张第6版第4栏至第7版第1栏，第139册，694-695页。

[26] 《滇、黔、桂、粤四省军警同盟会书》，申报1916年4月13日载。转载自黄振南、蒋钦挥主编《〈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3-915页。

[27] 《龙济光以广东都督名义宣布广东独立布告》（国民党政府国史馆档案）转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17-418页。

[28] 《广东独立详记》，原载上海《申报》1916年4月13日。（上海市图书馆史料，《申报》影印件）

[29]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民国广东大事记》，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11月，第56页。

[30] 《龙济光等宣布粤省独立电》（国民党政府国史馆档案），转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20-423页。

[31] 《日人之观察广东独立（与陆荣廷斡旋有关）》，上海《申报》1916年4月11日载。转载自黄振南、蒋钦挥主编《〈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0-911页。

[32] 李鸿祥撰《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卷，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1年8月，第150页。

[33] 郑开文撰《广东护国军第四军出发通电》云南《义声报》，1916年6月。（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34] 《李军改道问题之内幕》（免除土匪借滇桂北伐军名义扰乱），原载上海《申报》1916年6月7日。（上海市图书馆史料，《申报》影印件）

[35] 《粤东内部意见已渐融洽》，转载自黄振南、蒋钦挥主编《〈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2-953页。

[36] 《两粤军官之誓师团四义》上海《申报》1916年6月20日，转载自黄振南、蒋钦挥主编《〈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05-1006页。

[37] 《两粤军官之誓师团四义》上海《申报》1916年6月20日，转载自黄振南、蒋钦挥主编《〈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05-1006页。

[38] 《军务院直辖滇桂粤护国联合军》，转载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民国广东大事记》，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11月，第58页。

[39] 《会泽首义文牍》，转载自政协肇庆市端州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端州文史》（第一辑）第81页。广东省非盈利性出版物，1988年3月。